

两会

2019



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浙江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迈出高质量绿色发展新步伐

仙居县图书馆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盟

目 录

高质量绿色发展理论研究.....	3
城市绿色发展战略研究	3
绿色发展与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	10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研究	24
新时代推进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32
高质量绿色发展样例.....	38
新加坡绿色发展模式探析	38
成都市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	51
红色龙岩的绿色发展之路	54
皖南地区绿色发展探讨	61
高质量绿色发展仙居实践.....	66
让乡村乡愁乡野更加美丽	
——仙居县域绿色发展路径探索	66
仙居美丽乡村建设“绿色化”发展路径的思考	71
浙江绿色发展“仙居绿”勇立潮头	76
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中的协同治理与路径完善	
——基于仙居县的实证研究	79

免责声明：

浙江“两会”专题信息产品由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盟各成员单位联合编辑。信息内容取自公开的报纸、图书、期刊、数据库资源以及各大主流网站，每份专题我们都准确标明来源和出处，摘选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单位负责。

本期专题由仙居县图书馆编辑，如您需要更为详细的内容及跟踪报道，请与该馆联络。

迈出高质量绿色发展新步伐

高质量绿色发展理论研究

城市绿色发展战略研究

我国城市经济在保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等问题凸显。《2016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5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比高达 75.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当今中国而言，人民最重要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对良好生活环境的渴望；最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绿色发展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绿色竞争力将成为未来城市之间角逐的主要战场。

一、现状

《2018 年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数报告》研究发现，城市绿色竞争力水平的高低与地理区域、城市群、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差异和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

1、空间差异明显

从城市绿色竞争力地理区域划分的角度看，我国城市绿色竞争力的空间分布存在着明显的“洼地”现象。中部地区城市绿色竞争力相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较为薄弱，东部地区城市绿色竞争力优势明显。东部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数平均值达到 0.2701，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四个一级指标中，除自然资源与环境压力外，其余三个都具有绝对优势；西部地区城市具备的资源环境天然优势，对绿色竞争力指数排名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绿色竞争力整体水平处于中游；中部地区在城市绿色发展方面没有明显优势，城市绿色竞争力相对落后。此外，东北地区城市绿色竞争力与中部地区整体水平相当，绿色竞争力水平

亟待提高。

2、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形成具有“行政优势”

从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数的综合排名来看，不仅仅是在地理区域之间城市绿色竞争力差异明显，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同样存在悬殊表现。省会城市、副省级以上等区域中心城市绿色竞争力往往要大大高于其他地级城市。我国31个省会城市的绿色竞争力指数及其排名的平均值分别为0.2995和39，其中22个城市排名都在前50名之内(含)，除西宁排名第107位之外，其余8个城市也都排名50-100位以内，且城市间差距较小。这不仅得益于省会城市本身对资源的吸引力相对于其他地级城市要更加强大，同时得益于当前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的压力。事实上，城市绿色发展不但需要政府的推动，更需要企业、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形成持久的绿色内生增长动力。

3、呈现“同群效应”

从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地理分布来看，呈现同群效应的特征。我国城市绿色竞争力较高的地区往往会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一定的集聚，在城市群层面体现出高于其他区域的绿色竞争力优势，部分城市群已经呈现出协同发展的格局。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数综合排名前100强的城市中，有84个城市属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其中，有34个城市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加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共有60个城市位于上述城市群，其余24个城市则分布于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和呼包鄂城市群等区域性城市群。城市群内，城市之间通过构建有效的协调发展机制，在城市功能定位和分工的基础上，相互促进、共同高效地完成了城市群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合力为整个城市群内的城市绿色竞争力提升提供支撑。

4、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

我国城市群绿色竞争力水平不但存在显著差异，甚至不排除有些区域之间的差距会不断扩大，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所谓的“俱乐部收敛”是指拥有相同稳态特征的空间组群最终收敛于相同的长期增长路径。报告所考察的13个主要城市群绿色竞争力指数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城市群绿色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2510，中位数为0.2480，标准差为0.0234。城市群中绿色竞争力最大为0.2886，最小为0.2198。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的绿色竞争力高于平均水平，而哈长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低于平均水平。排名靠前的城市群得益于灵活的市场制度和有利的区位优势，预计未来仍可保持领先位势；而排名靠后的城市群受制于体制约束及地缘劣势，未来上升途径可能较为曲折。

5、城市规模是提升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密钥之一

从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绿色竞争力平均水平来看，超大城市组的城市绿色竞争力平均值为0.3556，该值要明显高于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绿色竞争力水平，是不同规模城市组中水平最高的一组。一方面，人口的集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因为人口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人口集聚能加快产业转型速度，通过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而获得更清洁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人口的集聚将加快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速度。人口规模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能创造更多科研成果，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扩散，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外部性，推动经济增长。在环境上主要表现为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提高，达到减少污染产生量

和排放量的结果，降低排污成本。从全国层面来说，大城市的发展恰恰有利于实现环保目标，因此城市规模是提升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密钥之一。

6、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绿色竞争力密切相关

从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数综合排名可以看出，绿色竞争力高的城市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绿色竞争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存在正相关关系。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位于高收入组，排名前20位的有16个城市位于高收入组。而且只有高收入组城市绿色竞争力平均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等偏下和中等偏上收入组中的城市绿色竞争力水平都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表明，地区环境污染程度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先上升后下降，呈倒U形关系。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从相对清洁的农业经济到污染较重的工业经济，再到环境友好的服务型经济，污染情况先增后减，或存在跨越现象。得益于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和资源效率的显著提升，使得高收入城市在经济基础、资源与环境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相对于中等收入组城市几乎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制约因素

1、科技水平亟待提升

尽管多数城市普遍都经历了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但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在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形成中存在显著差异。一般而言，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由增长动力决定的。如果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不会太高，城市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驱动。创新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全要素、全系统、全方位变革，各类创新中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是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全国看，我国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遥遥领先，

而其他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落后；从全球来看，目前我国企业的创新还是以外围技术和外观设计为主，核心技术的创新数量还较少，特别是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国外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数倍于国内。受制于科技水平的制约，部分城市短时期内较难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这一点对于诸多西部城市而言尤为重要。

2、资源环境过度消耗和破坏

粗放式发展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对资源环境的极度消耗和破坏，这给城市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压力，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向城市快速集中，带来的是对自然资源和周围生态环境的大幅需求。土地、资源和能源的极度消耗，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城市拥堵、环境破坏和能源紧张，诸如此类问题的产生降低了城市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同时还会产生大量的废物排放，带来诸多难以逆转的社会问题，严重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上海、天津和武汉等大城市，尽管城市绿色竞争力综合排名位于前列，但其更多的是依靠经济增长带来的拉动，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少和污染排放数量较多是其绿色发展的重要短板，如何减轻城市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压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

3、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偏低

城市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持续恶化，根本原因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从城市绿色竞争力的构成来看，在综合排名靠前的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昆明在经济增长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由于技术落后、能源利用率偏低、污染处理水平不高及单位产值能耗大等问题，其资源利用效率在全国的排名却较为落后。这样的不足和不充分既浪费了能源，又污染了环境。

4、政策制定和社会响应力度较弱

从排名比较靠后的城市分布来看，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环保意识和绿色行动普遍有待提高。主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

后，受制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政府政策的制定倾向于实现城市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而与绿色发展相关的产业普遍见效慢、投入大，因此，部分城市对于绿色发展的关注度不够。同时，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居民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和环境意识较为薄弱，对绿色产品需求度不高，绿色行动参与度较差。

三、途径

1、牢固树立城市绿色发展新理念

城市的本质是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家园，而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城市绿色发展。发展和绿色是密不可分的，失去绿色的发展，即使牺牲了环境、资源、健康，也只可能换来短期的增长，却换不来长期的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城市进步的根基在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为绿色发展提供资源补给和环境支撑，经济发展为生态保护提供资金扶持和技术支持，最终实现“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兼收并蓄。

2、全面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新模式

城市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而实现经济发展，将城市作为倡导绿色发展、践行生态文明的载体，将绿色作为城市发展最鲜亮的底色。一是通过开展城市环境保护和治理技术研究，加快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及绿色生活等环保技术的应用，大力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绿色标志性产业并形成比较优势，实现从源头到终端整个链条上节能、降耗和减污的目标。二是以绿色生态城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及绿色能源基础设施等建设引导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城市、海绵城市、绿色城市和健康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引导形成集约发展、绿色低碳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提升城市绿色竞争力。

3、培养公众绿色参与新意识

在环境保护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公众参与是政府和市场治理的有益补充。一方面，不但需要立法确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公众能真正获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政府要为公众参与培育良好的制度环境，提供顺畅的参与渠道，拓展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广度和深度，鼓励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公众参与。另一方面，需要着力培育公民的环境意识、提高公众的环境认知能力、唤起公众自发参与环境治理，这是保证公众参与效果的关键。未来我国城市绿色竞争力的提升应该也必将体现出更多公众的贡献。

4、推动城市群发展新协同

未来区域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以城市群为基础的区域间的整体竞争，因此，城市绿色竞争力的提升应该借助于城市群的力量，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国家级中心城市、区域性核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应形成合理有序的分工合作，城市间应避免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积极走集群化、错位化、创新导向的产业发展道路，促进群内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国家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核心城市还应当积极为周边中小城市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撑，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甚至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池”，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国家级中心城市、区域性核心城市对中小城市、县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受到了行政区划和体制的限制，因而并不突出，在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须打破行政和体制的限制。目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在绿色竞争力方面名列前茅，未来，这些城市群应该向着具有全球影响力与竞争力的国家级城市群乃至世界级城市群方向迈进，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城市群共同进步。

（来源：《中国国情国力》2018年第5期 关成华 韩晶）

绿色发展与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变革”，“要充分认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绿色发展时，三次谈到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对于绿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科学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并不简单地等于绿色发展方式，而是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在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时，既要实现绿色发展方式，也要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没有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就不可能有绿色发展方式，也就没有绿色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因此，科学地把握绿色发展与绿色生活方式构建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合理张力，以绿色发展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以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推动绿色发展，从而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任务。

一、绿色发展的要义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作为一种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一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内蕴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要求，但就其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而言，它主要是一种人们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以及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绿色发展的要义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和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实现人类的自

由与解放是唯物史观的“绝对命令”。恩格斯在谈到人的自由时指出：“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英国学者伯尔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人的解放，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领域，并且断言“自然中的解放是首位的”。尽管伯尔基并没有完全触摸到唯物史观的奥秘，但他把人在“自然中的解放”看做是人类“三维”解放之首，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唯物史观在探索人类自由解放的实现条件和路径时，从来没有忽视、漠视甚至抽掉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基本维度，而是始终将其作为基本视域而予以高度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

在唯物史观中，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以实践为基础，人和自然之间既相分化，又相统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谐发展。人与自然首先是统一的，在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和谐共生关系。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是深刻的。“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于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因此，自然界的丰富、和谐是人健康、幸福的重要源泉，是人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的发展又为自然界的发展提供方向引导和智力支撑。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批判了把人与

自然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和做法，明确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

人和自然又是有差别的，是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虽然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但人更是一种有思想的社会存在物，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因此，既不能把人完全看成是一种自然物，也不能把全部自然看做是人化自然。这种差别性或对立性主要表现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完全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人有意识、有思想，而自然界的其他一切存在物都不具有这个特性。这样，尽管人和自然界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这两个规律具有显而易见的异质性。在自然界，人适应环境，又改造环境，人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因而，人影响并制约着自然，但自然即对象也影响并制约着人及其实践活动。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中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条件与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只存在于他“对感性世界直观中”，因而是“假定的”。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是不存在的。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否认“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恰恰相反，正表明他们对“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的期待与向往，只是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和谐被破坏了。当然，这个“现实世界”是指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使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日趋强大。从表面上看，人类对自然一次又一次的征服，似乎是取得

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但实际上，随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加重，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人类日益陷入无法自拔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之中，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所有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国家或深或浅都陷入了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互“绞杀”之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域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被釜底抽薪——由于不断的“贫困积累”，“自然的生命力”濒临枯竭，人类“赖以生活的无机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可以肯定地认为，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认的，“如果不以损害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的本质为前提，这样一种制度一刻也不可能存在；它会毁灭人的身体健康，并把人类环境变成荒野”。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这个社会制度，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只会越来越尖锐。这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洞见，也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坚持的立场和观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才能真正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创造条件。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除了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个根本前提之外，人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对待自然的态度至关重要。虽然自然对于人具有先在性，但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主动权在人的手里。人类要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既要顺应自然，也要改造自然。

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的观点不属于唯物史观。这有两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方面：其一，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要创造一个人化自然，也要不断实现人的自然化。所谓人的自然化，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主体在把自然作为自身无机的身体的同时，也使自身真正融入自然之中，成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清醒地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及道理，才能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其二，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切计划、方案等都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因为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在对待自然的过程中，人类比其他一切生物强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合理地改造自然。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都只能是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亡。

毫无疑问，绿色发展理念与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或者说，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效地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建设生态文明，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也才能使人类正确认识和把握自身的命运。

二、生活方式是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因素

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因素很多，但人的生活方式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人的生活方式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他们经常使用“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并直接论述过人们的生活方式问题，具有丰富深刻的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不同方面或不同意义上使用“生活方式”这一概念的，在形式和内涵上都具有复杂性。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生活方式大约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生活方式是指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或人的活动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被纳入生活方式之中，构成生活方式的重要一维。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得很清楚：“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狭义的生活方式则是指人们消费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人们对“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使用“消费方式”、“享乐方式”、“生活需要”等概念，表达他们对人们的生活状况亦即人的生活方式的关切。

本文所讲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指狭义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全面性和丰富性，但主要是指人们的消费方式，或者说，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或主要方面。然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又离不开广义的生活方式的视域，因为，尽管生活方式不等于生产方式，但两者又不可分割。一方面，“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总体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另一面，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直

接统一”。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换言之，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影响和制约着物质生产方式。总之，两者互为前提、相互制约。当然，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就此而言，消费方式绝不是一种纯粹的消费方式，消费意味着生产。离开生产来谈论生活，犹如离开人们的现实需要来进行生产一样，都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在考察人们的消费方式时，不能没有生产方式这个视角。

在唯物史观中，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或者说，引起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冲突的，首要的、直接的原因是生活资料的生产，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而“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两个基本点：一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二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主要关涉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直接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有什么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已经开始显现，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对自然的占有和支配为前提。这是由资本本性所决定的。资本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资本虽然创造巨大的生产力，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种发展不是建设性的，而是破坏性的，它在推动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日趋尖锐的对立，使人和社会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之中。在资本统治中，自然界仅仅被当做资源的提供者，而人格化的资本则“像站在自然界

之外的人似的”，疯狂地吮吸“自然界的生命力”，而且，为了减少成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垃圾不经过任何处理而随意倾泻，造成严重污染，进一步地破坏了自然界的自我更新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断言：在现有关系下，“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它“只能造成灾难”。

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中，生产方式仍然是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因素。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或表征：一是GDP主义的泛滥。作为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状况，GDP本身无所谓对错，而且，一定的GDP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惟GDP是从，就会形成GDP主义。改革开放以来，GDP主义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甚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GDP的权威地位至今仍然没有动摇。在GDP主义的宰制下，GDP的增长以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可以肯定地说，GDP主义绝对是撕裂人与自然关系的非正义力量。二是资本逻辑的强大破坏性。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市场经济是以资本逻辑为构建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资本，需要资本逻辑的强力驱动。资本逻辑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必然使“现代社会如同置身于朝向四方疾驰狂奔的不可驾驭的力量之中，这种力量必然将现代社会带入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型风险之中，这其中包括生态破坏和灾难”。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尽管不能完全归咎于资本逻辑，但资本逻辑无疑是一个核心因素、根本因素。更重要的是，当资本逻辑与GDP主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时，自然界就被完全置于人的对立面，“人为刀俎，自然为鱼肉”。

但归根结底，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关系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从狭义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讲的，即主要地是指人们的消费方式。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的思想不一致。但实际上，这恰恰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

——尽管是常常被隐匿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本质时明确指出，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因而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因和根据。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时，用的是“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从来没有脱离“生活”这个核心要素。物质资料生产之所以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生活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消费。而且，“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由此可见，在唯物史观中，生活是根，具有本源性，是生产的动机、根据和目的，离开了生活，就没有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归根到底是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作用的结果，或者说，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生产方式来实现的。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益膨胀的物欲不断加深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人的全面而丰富的需要中，物质需要是最基本的，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物或自然存在物的根本保证。尽管人的物质需要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即人的物质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甚至没有止境。因此，可以把人的需要分为两大类：需要与欲望。需要是指每个人作为生命个体都有的生理上的、合理的需要，其基本特征是有限性或适度性，而欲望则“是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且其本性就是无所限制”。显然，人的欲望的日益膨胀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商品世界。正如贝尔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需要，而是欲望，因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自然界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以享乐主义为

特征的生活方式不断制造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快乐至死”的生活方式。

其次，外延式、粗放式的消费方式使自然环境难有喘息之机。外延式、粗放式的消费方式是指人们的物质消费重量轻质。当然，重量轻质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在绝对的意义，人们的消费既有量的要求，也有质的要求，但在现代社会，重占有却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重占有主要是对量的要求，追求的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这种消费是摆阔气、讲排场和铺张浪费的奢侈性消费，其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必然严重消耗自然资源，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严格地讲，人们消费的物质生活资料都来自于自然界，也就是说，人们消费得越多，自然界的“付出”也就越多。长此以往，自然界得不到休养生息，生态平衡能力不断弱化，最终必然导致生命力的枯竭。另一方面，人们在消费过程中，随意倾倒生活垃圾，不仅使人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也使遭受累累创伤的自然环境“雪上加霜”。

再次，除了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也是人们基本的生活领域。文化生活本来是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的通道，但在以资本原则构建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物质生活的附庸，甚至成为物质生活的一部分，文化的本真意义完全被遮蔽或消解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庞大的商品堆积”时，也使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成为现实。大众文化并没有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而是相反。一方面，文化之所以成为“工业”，根源于商品生产原则的普遍化。在商品化原则的支配下，文化作为一种需要，是通过生产出产品去满足的，因而，文化产品只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表面是文化，实质却是商品。在这个条件下，文化消费只重量，只有大量的消费，才能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商品化的文化也必然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仍然需要大量地消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商品化的文化已经不能起到“化人”的作用，“艺术的存在由于被降低到大众商品的消

费模式从而受到消弱。对我们来说，它已经失去了对我们的生存论的意义”。这种文化，倡导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把人培养成一种消费机器，形成“物化意识”。失去判断和批判能力，只知道消费，以消费为目的，以消费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不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目的。而是以创造出大量的消费人口和巨大的消费欲望为根本指向，这只能使以自然界的消耗为前提的享乐主义内化为人的一种“精神”，并进而转化为一场对自然界的更加疯狂的掠夺。

三、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实现绿色发展

既然生活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性因素，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解”，建立良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在于变革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意味着克服旧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建立一种新的、与时代要求一致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场革命，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建立一种能使每个人都能获得真正幸福的新型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建立以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为前提和表征。在中国道路进一步开拓，坚持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生活方式变革的根本要求在于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或者说，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是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是一个基础性工程。

同样，绿色生活方式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绿色生活方式是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或人的活动过程，是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时，“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狭义的绿色生活方式则主要是指绿色消费方式，即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最高旨趣，以高尚的消费道德、健康的消费心理进行科学的、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并通过这种消费方式引导

和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生态文明。就此而言，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实质上是一场消费方式的革命。

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极为艰难曲折的过程。道理很简单：作为人的生存样式，生活方式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融入到人们的骨髓和血液之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生活方式不仅仅代表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而且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追寻，具有超越性。因此，构建绿色生活方式，首先必须要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或者说，正确价值观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就有什么样的行动方向。当然，在某种意义上，生活方式本身就体现出一种价值观导向。也就是说，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价值观构成生活方式的内核，而生活方式则是价值观的具体运用和逻辑展开。脱离价值观的变革来谈论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无异于缘木求鱼。一方面，要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道路这一高度，充分认识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对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确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整体关系，在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建设美丽中国。“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要求就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另一方面要确立绿色消费观。消费观属于价值观的范畴，是价值观在消费问题上的体现。绿色消费观要求人们的消费方式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个根本要求，进行绿色消费。当然，正确价值观的确立还有赖于一个前提既对资本逻辑的有效驾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体性遮蔽、消解甚至取代了人的主体性，而在市场机制中，必须克服资本主体性，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复归。也就是说，在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推进绿色过程中，是人支配资本，而不是资本统治人，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应该说这是我们的根

本价值选择。

可以肯定，享乐主义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西方倡导的消费主义即是一种享乐主义，是与绿色生活方式根本对立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所提倡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它必然造成两个方面的“贫困积累”：一是自然界的“贫困积累”。消费主义以“庞大的商品堆积”为前提，但“庞大的商品堆积”是人对自然界疯狂掠夺的结果，必然造成自然界的“贫困积累”；二是人的“贫困积累”。消费主义以占有为前提，但占有并不等于富有，在占有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人们拥有财富是一种幸福，但如果对财富的欲望没有止境而达到无限贪婪和无耻的地步，实际上比物质上的极端贫困更令人不堪。这两个“贫困积累”必然造成一个总的结果：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人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也就接踵而至。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这是历史的洞见。问题在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作用的逻辑展开，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也登堂入室，甚至扎下根来，疯狂滋长。毫无疑问，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都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有关。因此，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克服或抛弃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当然，克服或抛弃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用节俭性消费取代奢侈性消费，用低碳消费取代一次性的污染消费。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积极地构建起绿色消费的社会机制，做到以适度为原则，以克己为前提，以合理发展为目标，以资源使用和污染物产出最小化为导向，从而保障绿色消费方式的合宜性。

构建绿色生活方式需要正确处理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的关系。实际上，两者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一方面，要用绿色消费方式引导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消费决定生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扩大内需是刺激生产的有效方式。扩大内需主要是着

眼于量，即以扩大消费的量来拉动生产。显然，这种粗放式的消费方式已经过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也在快速地转型升级。在绿色发展成为时代潮流的条件下，人们的消费应该把质放在首位。而消费的质体现在消费的内容、方式等方面，也就是说，在消费内容和形式上，要提倡绿色消费，守住生态平衡这个底线。只有绿色消费蔚然成风，绿色生产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要用绿色生产方式推动绿色消费方式的形成。马克思认为，“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而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这里说得很清楚，生产方式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所以，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又必须从生产端着力。生产决定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生产端的变革。当以消费刺激生产而导致一些行业、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或消费端出现非理性消费时，就要求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的是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消费能力严重外流的问题，但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引导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既是生产端改革的重点，也是人们消费方式变革的必然要求。

更重要的是，要提倡和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以精神文化的力量引导和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人的生活领域是全面的，人的需要也是全面的，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方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人们的需要中，“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随着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崇物质财

富和过度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并不符合时代要求，文化生活和消费越来越成为时代风尚。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讲的文化，不是商品化的文化或文化的商品化，而是与铜臭气绝缘与功利心相脱离，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为导向，融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文化。这种文化以“人”为本，以“化人”为目的，是一种高尚的文化。毫无疑问，精神文化生活构成了绿色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或根本底蕴。一方面，精神文化生活是一种绿色生活方式，精神文化消费是一种绿色消费方式。与物质生活相比较，精神文化生活具有低消耗低污染的特点，精神文化生产虽然也离不开自然界，但它对自然的依赖性以及破坏性较小。另一方面，在唯物史观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从来就不是彼此分离、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其中包含着文化与道德的因素。精神文化生活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道德素质，并进而对物质生活起一种引导或调节作用。很难想象，在没有人们精神境界和道德素质提高的基础上整个社会能够建立起一种科学的消费方式。因此，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保障，甚至是根本保障。事实上，随着中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的生活需要不断转型升级，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不仅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注重个性化和品质化。这不仅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或切入点，也给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契机。

（来源于：《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张三元）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环境新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提出了走

绿色发展道路的新思想，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上升到指导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理念，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大力破解发展难题，不断增强发展动力，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缘起审视：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都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是在学习借鉴世界绿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破解当下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治理困境，所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体现了开拓性、创造性、前瞻性的特有品质。

（一）对西方发展理念的批判借鉴

西方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解决问题的开门钥匙，无限制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掠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但伴随而来的是资源支撑不住，生态系统失衡，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在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倒逼下，西方国家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相继制定实施了绿色发展相关措施，产生了循环经济理论、绿色思潮、环境伦理等西方生态文明理论。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了《21世纪议程》，为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提供了行为规范。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单纯的GDP指标不再是评判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该国的绿色竞争力。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是指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南。为适应绿色发展的潮流趋势，增强生态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主动选择了绿色发展道路，从而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工业化后绿色化的老路，这是对西方发展理念的批判性借鉴，是对西方发展理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

（二）对我国发展问题的思考提升

传统发展观的功利主义导致经济增长超越生态边界，拼资源、高

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使得不可持续性的弊端日益凸显。由于不合理的过度开发利用，出现了水土流失、资源短缺、碳排放量增多等生态环境诸多问题，成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绿色强国梦的短板。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大力培植绿色经济增长点，坚决向绿色要生产力，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功转型的必然选择。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审时度势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这是发展理念的重大提升和创新。面对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一项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推进，不断抓出成效。绿色发展是绿色和发展的和谐有机体。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启动绿色动力引擎，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理念的经验总结和整体优化，是对我国现实发展问题的深刻思考。绿色发展理念所代表的绿色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之义，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协调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南。

（三）对马克思生态观及我党生态保护理念的一脉相承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与马克思生态观一脉相承。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人与自然通过生产实践互相作用，人类通过改造自然获得生存与发展，自然界也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上侧重对立斗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生态环境保护不好，社会经济发展势必受到相应影响。在深刻总结过去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将见子打子、被动修补式的生态观转变为主动变革、积极预防式的生态观，提出人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自然，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深化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与马克思生态观一脉相承，是马克思生态观的结晶。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了以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生态保护理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绿色发展思想的先河，提出了“绿化祖国”、“大地园林化”等生态环境绿色化的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环境立法的新思想，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加强了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化合作。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吸取了以往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严格的制度保障，要同世界各国进行最广泛的交流合作。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升华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事业，强调要为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空气常新、青山常绿、绿水长清的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二、要义透视：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我国生态环境现状的实际，要求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思维方式，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合目的性和以生态为本的合规律性相统一的绿色发展新思维和新战略。

（一）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全局设计的宏观思考——顶层思维与历史思维

顶层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把绿色发展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之中，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协同发展、齐头并进。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理念，从搞好顶层设计入手，将绿色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实抓好，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流通、消费等每一个环节，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从根本上遏制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历史思维。人可以从发展中获益，同时也要承担发展所带来的代

价。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现代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人口爆炸、疾病肆虐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还是依靠传统的无限制消耗资源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必将付出沉痛代价。因此，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倡导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家园。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思维方法，从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探寻中国绿色发展的合理性，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走绿色发展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

（二）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着力点与切入点思考——民本思维与精准思维

民本思维。接连爆发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给人民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带来压力，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盼越来越强烈，环境问题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环境就是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绿色发展的绿色福利理念，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充分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良好的生态环境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绿色发展理念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强调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充分体现了绿色发展的民生本质。

精准思维。绿色发展如同扶贫一般，必须“精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求真务实的问题导向，为当代中国绿色发展指明了适合的途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国际性的问题，必须在全球生态建设的大框架内加强国际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概念，为世界

能源革命吹响了号角。这体现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和魄力，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国际视野，体现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能够为国际社会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有效解决贡献力量，推动与其他国家实现更好地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三）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刚性要求思考——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

法治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保障。这充分体现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有机结合，突出了法治在绿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法律法规的构建，也注重法律制度的执行力和效果，同时也重视绿色法治理念的宣传和教育，提出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绿色发展提供良好法治环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绿色发展，使之成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导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纳入重点领域的立法内容，从法治的高度强化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要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此外，《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通过并施行，修订《水污染防治法》、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工作正稳步推进，我国生态环境法治体系不断完善。

底线思维。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底线思维主要体现在“生态红线”观念上，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工作的底线。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如果越过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这条生态底线，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和惩罚。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从坏处做足充分准备，从而争取最好的结果。要严格坚持生态红线底线思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保证人民的生态福祉。

“生态红线”观念蕴含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这对于推进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四）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思考——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

辩证思维。习近平总书记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入手，强调科学把握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对立统一性，抓重点、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是发展的基础条件，环境生态越良好，发展的基础越厚实，绿色发展更强调发展的效率和质量，是一种高效优质、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全面看待问题，严禁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环境，坚持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两手抓。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角度进行深刻思考，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两者全面深刻的理解，展现了对普遍联系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娴熟运用。

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河流、山脉、森林等要素都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只有立足整体，着眼全局，才能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同处一个世界，在谋求本国的发展同时要促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要有战略眼光，需要整体谋划，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强调治理环境问题，必须建立多部门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坚持标本兼治、整体统筹、多措并举，在绿色发展的统一行动中取得协同治理优势，保障永续发展。

三、价值归旨：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

（一）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民生情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当前，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生态问题日渐突出，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

生活。一旦家园遭到破坏，人类就会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也就没有了归属感，更不可能有幸福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走绿色发展道路，为老百姓创造天蓝、山青、水绿的优美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为民谋福。“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前推进绿色发展理念，努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最高标准的重要体现。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突出了生态环境与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民生情怀。绿色发展是一条永续发展的路子，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将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到治国理政方略的战略高度，强调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绿色发展理念已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绿色新政的理论指导。为推动当代中国全面建设、整体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人类开创绿色文明发展道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建设美丽中国新格局

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也为中国梦的如期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经过几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没有绿水青山的金山银山迟早会耗尽，空守绿水青山的日子难以为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复兴。实行绿色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路径。只有实施绿色发展方式，才能凝聚一切正能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观念引领行动，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绿色发展理念必将内化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针，成为绿色富民、绿色兴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行动指南。

（来源于：《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9期 田冰）

新时代推进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出发，坚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这些重大创新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必须创新绿色发展模式，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必须充分发挥体制机制的保障作用，加大顶层设计，健全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坚持发展的人民主体地位，实现绿色富国和绿色惠民。

一、创新绿色发展新模式

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多依赖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投入，从而造成了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践中必须走绿色发展道路，探索绿色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从根本上来说，绿色发展方式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得到高效、循环利用，生态环境受到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真正实现山更绿，水更清，民更富。

1、形成绿色发展方式。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从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过去，一些地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方式是难以持续的。实现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一是要形成绿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而绿色化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内涵和根本方向。实现绿色增长，关键在于大幅增加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减少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资源投入的状况。近年来，科技进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相应地降低了自然资源等其他要素的投入。二是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培育绿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新常态下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改变过去我国产业结构偏重于能源资源消耗大的重工业的状况，大力发展能源资源消耗低的新兴产业和新型服务业，着力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型清洁产业和绿色产业。三是大力推进绿色生产。实现绿色发展要做到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比如，从源头上控制有害原料进入生产领域，生产过程中注重减少材料和能源浪费，提高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量。生产末端要加强废弃物的再利用和无害处理，真正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

2、培养绿色生活方式。绿色发展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需要我们在思想观念、消费模式、社会治理等方面朝着绿色化方向变革。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一是要养成绿色生活的自觉行动。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到绿色生活是一种社会责任，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生活中应更多从环保的角度而不是经济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自觉做到节水、节电、节能，绿色出行，妥善处理垃圾，最大限度地变废为宝。二是促进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消费者不仅仅从自身角度出发的消费行为，而是还要考虑到自身消费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即在消费的时候选择那些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和商品。比如，购买不过度包装的商品，购买有机绿色食品，不购稀有动物皮毛制品等。通过绿色消费，使得人们的消费行为更加有利于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同时，绿色消费可以引导绿色生产，有利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三是加强制度建设。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既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也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引领作用。要加大对损害生态环境行为

的监管和处罚力度，采取激励引导与惩戒兼顾的策略，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热爱绿色生活的良好氛围。

3、培育绿色文化观念。文化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是影响一个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实现绿色发展，必须培育绿色文化观念。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其实，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绿色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于我们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现代化强国目标具有重大指引作用。一是要把绿色文化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让绿色文化成为当代所有人的价值追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必须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二是培养公众的绿色文化意识。公众的绿色文化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正确的培育和引导。要把绿色发展作为学历教育包括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让每一名学生、干部包括普通群众都了解和掌握绿色文化知识、树立绿色价值观。要从满足公众公共文化需求的角度，将绿色文化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创作一批文化作品，创建一批教育基地。只有让绿色发展观念深入百姓心中，才能有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绿色实践的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

二、形成保障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

实现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是重要保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体制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尤其重视发挥法律法规的作用，明确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1、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绿色发展既要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更要重视市场的作用。用好市场的力量，确保市场对资源配置起

决定性作用，就会推动增长方式向绿色转变。价格和税收作为市场发挥作用的有效工具，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可从根本上扭转资源利用中的低效和浪费现象。一是确定自然资源产权制度。长期以来，自然资源产权关系不明确、产权边界不清晰，在市场方面，难以发挥市场对自然资源资产配置的作用，阻碍了对自然资源资产的高效利用，造成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诸多问题。建立健全环境产权制度，确定自然资源价格，制定财税政策，将生产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环境成本显性化等等，能极大地促进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二是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改变目前排污成本低、浪费成本低等突出问题。三是积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第三方治理是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企业进行污染治理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将有效避免原来企业在自身污染治理问题上经常出现的故意违法排污的问题，实现污染治理的市场化、专业化和环保产业化。

2、健全制度体系。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事关子孙后代的“福祉工程”，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要形成一个规范高效的发展模式，当务之急是解决制度化、法制化的问题。一是依靠严格的法律。法律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只有“严”才能取得更好效果。面对当前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必须制定最严格的法律。比如，2015年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环保法，规定了“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一系列措施，以组合重拳方式打击企业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只有使严惩重处成为环境污染治理的常态，才能有力遏制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健全制度体系。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生产、生活各方面，要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和制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八项制度

构成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三是加强法律法规之间的配套衔接。要使法规制度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做好法规制度的衔接和配套工作。绿色发展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其他各领域的制度必须体现绿色发展的理念和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绿色发展的“合力”，不断推动绿色发展走向深入。

3、完善管理和监督机制。实现绿色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职能。一是完善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这将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保甚至干预地方环保工作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针对区域性污染和跨界河流管理使用问题，当前各地正在探索建立跨区域的环保机构；作为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举措的环境保护督察和环境保护“约谈”办法的实施，对约束地方政府落实环境保护的各项规定起到了更加明显的作用。二是完善和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地方党政领导对本地绿色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对领导绿色发展不力的必须实施责任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明确对党政领导干部在决策、执行、监督和利用职务影响过程中所造成的25种情形进行追责，一方面，对干部离任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客观评价其任期内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责情况，造成生态环境生态损害的要追究责任；另一方面，充分考虑部分生态环境损害情况的滞后性，对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终身追究责任，为其任期内开展决策套上了“紧箍咒”。

三、实现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新伟业

绿色发展理念不仅体现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同时更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绿色发展将更好地指引我们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伟业。

1、推进绿色富国。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现代化强国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几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富强”与“美丽”密不可分，绿色发展理念内含着实现绿色富国的重大时代命题，绿色发展是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早在2010年4月，习近平同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时就鲜明地指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这一大趋势现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绿色工业革命，我们与发达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一些诸如技术和资源领域不仅并不落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实现绿色富国。一是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主要是依靠技术创新，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资源循环利用为核心，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使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二是实施绿色制造。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重要支撑，但如果继续是传统的制造业和制造技术，则有限的资源环境难以支撑这样的制造大国地位，这就要求必须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绿色制造。绿色制造是一种现代制造模式，它是一种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成本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制造模式，中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绿色发展”是其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三是实现绿色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必须依托绿色科技创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对我国的绿色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必须把科技创新作为战略基点，支撑引领绿色发展。最关键的是要着力突破绿色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要驱动力，用生态安全的绿色产品拉动内需，用循环经济的总体思路构筑区域经济结构，用低耗环保的行为构建新的生活模式。

2、实现绿色惠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之一，绿色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过去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就必须实现绿色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发展就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对人们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则是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不能或缺的，更是金钱不能代替的。所以，要通过绿色发展，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一是通过绿色发展实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让百姓过上更加富裕的物质生活。绿色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实现更加有质量的发展，经济社会与自然更加协调的发展。二是给百姓提供更多的生态公共产品，让百姓能呼吸上新鲜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安全的食物。三是实行绿色扶贫。要实施绿色扶贫，把精准扶贫、发展产业与生态保护、清洁乡村结合起来，推行绿色减贫，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促进贫困地区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推动农民绿色增收，包括利用贫困地区独特的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

（来源于：《江南论坛》2018年第8期 郭秀清）

高质量绿色发展样例

新加坡绿色发展模式探析

绿色发展是当今全球发展的时代旋律。从内容上看，它涵盖适度开发和利用有限的生态容量，建设宜居的环境；在降低污染和排放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营造公平的社会，促进人类福祉。从时间维度上看，它强调提高生产效率、坚持可持续性。从空间维度上看，它伴

随着城市化、人力和资本、资源的合理迁徙和配置。从评价体系来看，它包括节能、增绿、减排、结构优化、竞争力提升几个方面。

纵观当代各国发展模式，新加坡应属绿色发展行列，被称为“亚洲最绿城市”。新加坡城市狭小，人口密集度高，绿色发展的历程和实际成就如何？城市生态容量是已经超出承载还是能够供应高品质生活？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之间如何共生和互动？节能减排的成效如何？技术科研上有何优势？绿色发展经验如何推广？……本文尝试做一些探讨。

一、新加坡绿色发展的理念、政策与制度

李显龙总理认为，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还要考虑人生与社会的目标，包括创造一个优雅的环境，拉近贫富之间的距离，使社会更和谐，适度保持经济增长，同时为人民带来高素质的社会条件。新加坡在全社会树立了生态文明理念，通盘考虑了环境、经济、民生，在政府的统一引领下，各项政策协调推进，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各项工作都被纳入绿色发展轨道。

（一）理念

1、着眼长远、服务整体

新加坡总是高瞻远瞩地分析世界发展态势，以高标准定位未来。早在建国初期，政府就决定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开发方面，一直预留土地为将来利用做准备，其间注重现代工业建筑与传统文化景观的协调，所以城市面貌既具鲜明的都市气息，又保留了宗教、族群文化遗产。在产业发展方面，结合自身优势，考虑国际需求，预见产业潜能。如筹建樟宜机场时，尽管颇费周折，李光耀政府始终坚持把航空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终于在科学选址和评估后建成了国际一流的机场环境，而全球航空枢纽的地位不断为人力和资本牵线搭桥。

2、实行价值增长到价值创造的转变

创造价值包括新业务、新价值和新方案。在吸引投资时，注重策略的“选择性和针对性”，把精力集中在强项和优势上。动力型发展要求新加坡始终处于扩张的状态，不断在工业生产和金融领域更新换代，如2010~2016年的重点增长项目。这五年间，新加坡优先推动先进制造技术、生物医药、数码科技及城市方案。重点制造业的不断增长将给经济竞争力提供支持，继续创造就业；生物医药将加强国人应对疾病的能力，占据世界生命科学领域高地；数码科技与智慧国计划相辅相成，强化公共服务。

3、社会置于个人之上

在新加坡，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共同家园已经植入每一个人的心中。社会倡导尊重他人、爱护公共空间、节约环保、绿色消费等公序良俗，任何行为都要考虑环境的外部效益。企业把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作为经济效益的衡量标准，公众自觉选择减少食物浪费、废物利用、节电节水的生活方式。

4、重视人力资本的培育与提升

由于国土范围和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新加坡把人才作为绿色发展的着眼点和主要增长力量，认为只有通过人才的卓越智慧和不懈奋斗才能把国家的发展潜力不断地从土地、技术、资本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李光耀说道：“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决定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团队合作以及职业道德使他们在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

（二）政策与制度

1、适宜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人口政策

充裕的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劳动力数量又必须以资源承载力为限度。为了保证适宜的劳工供给，新加坡各阶段都配套出台了相应的人口政策：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当时人口增长处于较高水平，而岛国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极其有限，政府为了考虑民

众的生存和就业问题，实行“一个家庭，两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绝大部分人已经解决了生存与就业问题，新建的城市格局亦提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而生育率却持续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了保持一定的人口替代率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政府改变政策鼓励生育，尤其依靠吸收大量移民如外国劳工、专业人士和商界精英来补充本国人口；2010年以来，由于交通、管理压力加大，本地人口的就业机会减少，政府着手限制外来人口。

2、预算与开支平衡

考虑到发展的可持续性，新加坡不愿牺牲将来和后辈的利益发展。政府不是靠贷款来发展，而是依靠储蓄来投资。“由于贷款需要偿还，我们仅为生产目的借贷，从不为消费目的借贷。……政府的营运收入足以支付其营运和发展开支。”

3、倾向环保的法律与行政制度

新加坡法律明晰，政府廉洁，司法严格。在强有力的法律控制下，企业设立和产品的市场准入都有严格的环评和质量审查来控制污染和排放。如果发现有破坏环境、影响公众健康的行为，处罚非常严厉。绿色产业可获得贷款、补贴、碳税、关税等优惠。居民日常生活实行差别电价和水价。

二、新加坡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构筑绿色产业结构，充实绿色发展实力

新加坡产业结构合理，拥有一系列全球领先产业，目前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根据2016年3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报告，新加坡已经超过香港，是仅次于伦敦、纽约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并且和前两者差距正在缩小。同时，新加坡还是世界著名的运输中心、国际贸易中转站（世界第二的集装箱吞吐量）、石油化工中心（世界第三大炼油国、第二大加油港）、电子产品制造中心、热门旅游之地。到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已

经低于 0.5%，农业重视精耕细作、集约化经营，制造业与服务业占绝对优势。到 2015 年，农业几乎为 0，第二产业占 GDP 比例为 25%，第三产业则占 75%。

建国初期，新加坡经济结构单一，只有转口贸易，没有工业。新加坡经历了三个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过程不断为绿色发展提供环境容量支持，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加速现代化进程，提升社会文明程度。20 世纪 60~70 年代，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了吸引外资，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工资吸收跨国公司，增加用工岗位，使国民充分就业。制造业重点发展石油提炼和石油化工、电子业、修船造船业。同时大力兴建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业、通讯业、金融业。国家由刚建国时期依赖转口贸易、加工出口的传统、单一经济模式转变为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多元经济结构，国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基本能够得到满足，城市规模初见端倪。20 世纪 80~90 年代，工业模式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生产方面，日趋精益化和精细化。技术方面，迈入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产能，工业结构更加合理。服务方面，走向专业化、系列化、高效化，旅游、商业、服务业兴盛起来。劳工和人才方面，塑造出熟谙英语的劳工队伍，不遗余力地加强他们的技能和科技水平，提供稳定的形势、良好的就业和开拓事业的机会，优质、体面的生活。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依托跨国公司和科技研究中心实现知识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产业链由中低端向高端研发、营销策略等环节延伸。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如生命科学、新材料、环境与水资源技术研发、数字媒体等。

新加坡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批在现今被表述为知识型经济的国际市场中竞争的国家之一。

（二）组建科研生态系统，打造绿色发展平台

新加坡一直把研究、开发与创新作为绿色发展引擎，组建了政企

合作、产学研一体的科研生态系统。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整合、通力配合不仅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且整体提高了绿色标准。如水源采集和污水净化方面，新加坡公共事业局向企业开放国家水务基础设施，测试采水净水技术，成功解决了水源短缺问题，保证了饮用水健康标准。陆路运输的整体规划设计方面，雷诺-尼桑、三菱汽车等企业和经济发展局、陆路交通局合作，结合用户体验，采用智慧交通系统，利用远程信息处理等技术开发交通最佳方案，设计零排放车辆。建筑节能方面，计划到 2030 年，80%的建筑获得建屋发展局的绿色建筑标识，推动企业利用太阳能、光伏板、低辐射系数玻璃进行绿色建筑设计。集产学研一体的科研生态系统使清洁技术公司有丰富的机会和当地的教育、研究机构（包括新加坡太阳能研究所、南洋理工大学能源研究所等）合作。2012 年，新加坡每百万人中的 R&D 研究人员（参与新知识、新产品、新流程、新方法或新系统的概念成形或创造，以及相关项目管理的专业人员，包括参与 R&D 的博士研究生）为 6442 人，超过了日本（5084 人）、德国（4379 人）、中国（1036 人）。新加坡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例为 45%，超过了日本（17%）、德国（16%）、中国（26%）。借助复杂的信息和运输基础设施及一系列正在施行的信息工程计划，新加坡整体的公共运输和服务都实行数据化，为高效管理绿色发展提供支撑。

（三）着眼国外需求市场，拓宽绿色发展空间

新加坡并不把发展空间囿于有限的国内需求，而是考虑全球的生产与消费走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国外市场，为此赢得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与前景。世界范围内造船和船舶维修业的兴盛，越南战争逐步升级带来的对供应品的需求，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恢复，以及东南亚深海石油开采的发展，都让新加坡的经济大为受益。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人民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加，城市化进程快，人口密集度高，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的城市化技术方案、消费者产品和服

务、卫生保健、资讯升级的需要大幅提高。新加坡在这些项目上都具有极强的优势并将进一步发展，如吉宝公司拥有从中国延伸至中东的环境工程业务，胜科工业集团业务遍布六大洲，拥有丰富的综合性城镇发展经验，提供可靠的能源和水务。新加坡还将在阿尔及利亚建造世界最大的海水淡化基地。

（四）降低消耗与污染，缩小绿色发展成本

1、能源节约与清洁能源利用

由于本地能源匮乏，新加坡极其重视其利用效率，能源转化为GDP比率相当高。2012年GDP单位能源消耗（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为15.4，高于日本（9.9）、德国（11.1）、中国（5.3）。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煤炭，由原来的主要利用燃料油发电转至利用最清洁的天然气发电。2000年，天然气发电份额为19%，目前份额增至90%。除此之外，还利用垃圾焚烧发电，1978年就建立了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在有接近40%的垃圾通过焚烧发电，除了在土地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减少了垃圾占用空间和填埋压力，还能满足公共照明需求。焚烧产生的残留会移除出来，避免直接排放到空气中。太阳能和风能利用较少，但下一步将重点开发。许多清洁技术公司看中了新加坡的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美誉度而选址于此。全球第一的风能发电生产商丹麦维斯塔斯公司，已经在新加坡建立亚太总部，作为丹麦以外的最大的风力技术中心。挪威可再生能源公司正在此兴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综合设施，为全球提供十五亿瓦特的太阳能。

2、控制排放

自2002年开始，新加坡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公吨数一直低于高收入非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2011年为4.3，高收入非经合组织国家为11.7。虽然碳排放量占全球的0.2%以下，对整体气候变化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新加坡仍然坚持严格控制碳排放量。

精炼厂、发电厂、机动车通过使用清洁燃料、充分燃烧技术降低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减少对臭氧的破坏。为了限制车辆排放，配合公交的主导地位，新加坡政府利用“拥车证”，征收高额旧车税和进口税，利用公路电子收费系统，进行旧车更新换代以控制车辆数量，并倡导购买小排量私家车。为了保持公路旁的树木不因汽车尾气和尘土蒙上污垢，有关部门采用污染测量仪表检查车辆的油箱和其他可能造成污染的部件，经检测后认可和批准的车辆才能上路。3年至10年车龄的车辆必须每两年就检查一次，而且超过10年车龄的车辆必须每年检查一次。由于从马来西亚过来的货车往往排放大量的废气，所以新加坡政府对这些排烟超标的车辆实施罚款政策。对于主要不在公路上作业的柴油机车辆（如起重机、挖掘机等），严格按照功率大小规定排量范围。法律还规定，除了特殊交通状况和特殊车辆（如救护车、消防车、冰箱卡车和大罐子卡车），在车辆静止的情况下，驾驶员离开车辆时留下引擎空转是一种犯罪行为。初犯一般最高可罚款2000美元，屡犯最高可罚款5000美元。工业废水流入下水管道或河道有温度、颜色、PH值等排放标准不符合的，必须经过处理，达到标准后才能排放。

3、提高资源利用率

新加坡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做法见诸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筑的屋顶栽培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墙面外檐收集太阳能和雨水，建筑内的公共区域采用LED照明和能源可再生电梯。家用电器和设备上都带有能耗和水耗标识，70%的家庭会选择节能和节水电器和设备。自2000年以来，新加坡垃圾回收利用率就超过了40%，目前已经达到61%，计划到2030年达到70%。私人住宅、学校、工厂都有垃圾回收计划，一般每五个街区有一个资源回收站，每150米就有一个垃圾筒。

三、新加坡绿色发展的成就：环境、经济、社会共生共荣

现在的新加坡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设施现代、交通

便利、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新加坡绿色发展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相得益彰：贫乏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新加坡聚焦于刷新人力资本，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断积累的社会财富又使新加坡能填海造陆延伸本国领土、打造世界物流集散地，一流的基础设施又吸引了商业投资和海外移民，促进了社会繁荣……每项效益的增殖都是整体价值的提升。

（一）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绿色发展的环境效益

新加坡仅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把一个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棚户散居、陋屋拥挤的脏乱小岛建设成了一个宜居的清洁社会。尽管工业化程度高，但是新加坡在发展中采取抗污染措施，放眼望去，城市不全是钢筋混凝土的“黑色森林”，而是生机盎然、工业景观和文化景观互相辉映的花园城市。

1、多层次、广覆盖的绿化

20世纪以来，新加坡森林占土地面积约为23%。鉴于湿热的气候和有限的用地，新加坡不仅注重地面的绿化，也注重空中绿化。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具备多层次、多品种的植物景观。绿地以大树草坪为主，周边以造型植物分层。建筑物的绿化有明确规定：公共住宅区中，新建的建筑物占地不能超过35%，余下65%的地面必须用于绿化。公路和建筑之间有15米的绿化间隔。空中花园、植物外墙、生态屋顶、绿色廊道俯仰皆是。建筑物的空中绿化通过造型设计、精巧布局，让建筑在通风、采光、视野开放的同时又可以利用外墙的植物过滤强光和灰尘，保持室内的凉爽，并同声学天花板一起吸收室外噪音。2007年，其绿化面积达到47%。

2、高标准的卫生条件

由于严格控制排放，除了森林火灾、为开辟农田而进行的露天焚烧、邻国污染空气飘至的情况，新加坡一直空气清新，一般不会受到雾霾的影响。以“新生水”为代表的饮用水符合世界上最严格的饮用

水标准。获得经过改善的卫生设施和水源的城市人口比例皆为 100%。食品检疫严格，不仅需要标明生产日期，还要标明具体时间。路边的小吃摊也需要获得政府的卫生认证才能经营。

3、通畅的交通

尽管人口密度世界第二，但新加坡拥有通畅的交通。在国际咨询公司利特尔公司发布的“城市交通指数”上，新加坡排名为全球第六最佳交通城市。新加坡出行可选择多种方式。公交出行占全岛交通的 2/3。为了保持通行无阻，缩短出行时间，设置了公交专用道路、车站、停车场和路面标识，红绿灯切换时间会根据车流量而调整。环岛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是一道别致的景观，既分流了近距离出行的人群，又方便市民在徒步、慢跑或骑行中一边锻炼身体，一边欣赏城市风光。方便的日常生活缩短了居民出行距离，减少了交通流量和碳足迹，有效地避免了交通拥堵。

（二）一流的国际竞争力和发达的贸易——绿色发展的经济效益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以“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从不发达国家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占亚洲四小龙首位。2014 年人均 GDP 为 56284 美元，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表的 2015~2016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新加坡排名第二，仅次于瑞士。这是新加坡连续第五年排在瑞士之后。全球竞争力报告主要将竞争力分为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商品市场效率、教育与培训系统等 12 个方面，以此衡量全球 140 个经济体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的能力。该报告指出，新加坡在所有评估领域都取得稳定表现，12 个指标中有 9 个名列前十。

卓越的竞争力催生了大量的商机与贸易。新加坡有 4200 家跨国企业区域总部，占亚太地区首位，是跨国公司建立国际总部的首选地。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6%，比邻国马来西亚（167%）与印度尼西亚（47%）要高出许多，也超越了其他在现代化发展初期以外向型

策略为导向的亚洲经济体，如台湾（135%）、韩国（107%）和泰国（138%）。“唯独香港（393%）在经济上的开放程度比得上新加坡，但也只有在把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往来也视为外贸，香港才能有相等的成绩。”新加坡把自由贸易原则和经济外交目标紧紧地结合起来，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等对外经济政策有效地控制了地缘政治复杂性下的国内国外不安定因素。

（三）安居乐业的生活——绿色发展的社会效益

新加坡居家、就医、上学、工作十分方便，社会井然有序。同时，为促进社会公平，弱势群体得到有效照顾，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1、以“组屋”为核心的和谐社会

新加坡居民不仅拥有干净、整洁、宽敞的楼栋和小区，还享有友好的邻里关系、有序的社会管理和治安。目前新加坡85%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组屋之中，整个国家没有一处贫民区。“组屋”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项惠民安居工程。建国初期，居民住房问题严重：中心城区存在“房荒”现象；各族群分区居住，很少往来，缺乏交流；居住条件简陋、脏乱。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均衡分布人口，促进种族交流，在居民收入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新加坡兴建了体现公共性的组屋。组屋的贷款可由就业的储蓄通过中央公积金来偿还，形成了就业、储蓄、住房良性的三角关系。组屋的可负担性使中低收入家庭不会与主流社会隔离，居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各民族按一定比例混合居住，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和谐共存。即使是新移民，政府也会留意他们的住房资料，分散他们，确保大多数邻居是新加坡人，使居民感受到新加坡文化，融入新加坡社会。组屋区均配套健身设施和活动场馆，外围环绕商业和轻工业。居民不管是购买生活用品，还是健身、休闲，都十分方便。充裕的、开放的公共空间便于人们交流和休闲，增进了邻里之间的熟悉和了解，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加强了居民对公共环境的监督和爱护，也降低了犯罪的可能性，构建了良好的治安

环境。

2、发达的基础设施

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谓是白手起家，勤恳与辛劳的人民把建国时穷苦落后、资源匮乏的热带森林建成了道路、地铁系统、电站、水库、污水处理厂、垃圾焚化厂等基础设施齐全的现代都市，已建成的商业、工业用地占用率接近 90%。80%的居民从家出发，10 分钟之内可以到达公园。众多的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历史遗迹随处可见。医疗方面，条件优质且供可应求，普通民众皆可负担。2015 年，新加坡有病床 12505 张（私立医院 2903 张，公立医院 9602 张），平均 443 人拥有一张病床。每 10000 人中有 21 人是医生。学校方面，2014 年，新加坡有教师 26633 人，学生 359386 人，师生比例为 1: 13，小学、中学、大学预科班级的规模都在 30 人左右。

3、高就业率和注重公平的再分配政策

建国以来，失业率不断降低，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证。在 1960 年，新加坡的失业率高达 10%。到 70 年代中期，新加坡就实现了完全就业，也就是失业率被控制在 3%以下。2015 年，失业率在 2.8%。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新加坡拟定了体现公平和累进特征的再分配政策。就业机会少、技能低、有特殊困难的中低收入阶层可通过就业入息补助、特别现金补助、特别保健储蓄、水电费回扣、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教育等应付日常开支、降低生活负担。老年人可利用乐龄助行基金、老年照顾基金保持健康、安享晚年。有继续工作能力的老年人可以享受遍及各种行业的再入行培训，补充国家需要的劳动力，雇主和雇员都能得到财政补贴。社会为具备一定知识水平但需要看护家庭的妇女提供临时或在家能够完成的工作。富裕阶层需要交纳更高的房产税和豪华车辆注册税。

四、新加坡绿色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国际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ELA 在 2015 发布的“全球最适合居住地

区的调查”显示，新加坡连续16年蝉联榜首。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文章《什么是治理》中，视新加坡为全球良治榜首。在当代世界，新加坡堪称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提高人类生存条件的楷模，且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保持活力。纵使各国国情不同，但新加坡绿色发展的一些经验，在全世界仍有普遍借鉴意义。

（一）审时度势，从自身实际出发，化挑战为机遇

事实证明，在国际形势对新加坡提出挑战时，这个小国都能找到转型机遇，顺应世界发展形势，从而化险为夷。刚建国时，马来西亚试图绕开新加坡港并对新加坡工业筑起关税壁垒，新加坡决议迅速建立外向型的工业形势。从1968年到1971年，英国从新加坡撤军。这给新加坡的安全和经济带来了巨大风险，许多人可能因此失业。新加坡政府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责难上，而是借助英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对失业人员再培训、建立航空体系、利用获取的优良地产和其上的设施和附属设备开发商业潜力和石油勘探事业。20世纪60-70年代，为了振兴经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保护性的关税壁垒，实行进口限额，对大型跨国企业敬而远之。但是，为了获得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增强本国劳动人口素质，新加坡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保护效率低下的本土工业企业，邀请跨国公司把资本、技术和技能带入新加坡。在化挑战为机遇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紧密团结，凝练干劲，国家认同也进一步增强。

（二）政治为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新加坡政府以高效著称，人民行动党作为国家发展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其强有力的领导下，政府的治国理念能迅速转换为治国行动。在国内，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不免遇到一些与现行政策相左的政治主张，但为了集中关心经济事务，稳固社会发展轨道，政府都毫不客气地采取强硬手段。整个公务员队伍强调实干甚于意识形态，来自于不同领域的精英把自己的专业技能运用于解决时下问题，且清廉程度一

直位于世界前列。国家力求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政府只是创制规划、监管调节，发放补助，制造机会平等，力求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三）充分发挥社会和民众的力量

新加坡经常举行保持清洁比赛，国会议员和社区领导一起组织，居民全体参与，社会组织还经常开展“捡垃圾活动”。各种各样的竞赛和评比使爱护环境蔚然成风，“零浪费”文化感染到每一个人，更多地点转变成清洁卫生模范区。丰富的绿色倡导活动使新加坡从小孩到成年人都养成环保意识并付诸于行动。

新加坡突破了地小人稠的局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取得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人和谐共存的卓越成就。其绿色发展经验今天越来越受到他国的重视和借鉴。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处理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关系上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如用地和资源紧张、空气污染、房价上涨、交通拥堵、贫富分化、治安无序等，可从新加坡的环保理念、社会政策、城市设计、产业布局、低碳技术、全民参与等经验中，吸收它的化劣势为优势、化需要为商机的绿色发展之道。

（来源于：《上海城市管理》2018年第1期 定光莉）

成都市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传统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绿色发展道路。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将绿色发展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任务，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推进绿色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成都绿色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成都位于四川省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介于东经 102°54'-104°53'和北纬 30°05'-31°26'之间，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地区，生态资源比

较优势突出。近年来，成都在构建田园城市生态体系和打造世界田园城市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全域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和绿色城市发展，形成了“两山两湖两网六片”市域生态格局，在全国率先集中力量推进环城生态区建设。但是，成都在绿色发展进程中也凸现出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

(1) 节约集约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效果欠佳。成都作为长江上游水资源保护和涵养区，同时又是西部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引领示范区和西部经济中心，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突出。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导致河流污染严重，水环境的生态承载能力受到极大挑战，资源集中利用和节约开发的理念还没有根植于心，付之于行。

(2) 绿色发展的粗放式开发问题突出。近年来，成都在绿色建筑、绿色小区、生态绿道、循环农业等方面探索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邛崃市利用“4.20”灾后重建契机，把夹关万亩生态茶园建设与乡村酒店结合起来，打造了绿色生态养生主题茶园等。尽管有了这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却没有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推广运用，在区域范围内，镇与镇之间、镇与村之间、村与村之间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全局一盘棋的思路进行整体开发，从而导致绿色发展的粗放式开发与经济效益不平衡的问题。

(3) 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压力。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市产生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企业829家，产生固体废物总量约513.4吨。工业产值增加的背后是以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而换来的生态环境持续被破坏，生态修复的压力十分巨大。

2、成都实现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

(1) 推行“绿色开发+低碳循环”模式。发挥川西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坚持环境保护第一，因时因地发展有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变资源为资本、变资本为资金，着力推进绿色生产方式。在温江、邛崃、蒲江等“西控”地区优先发

展绿色、有机、生态产业，积极创建区域特色品牌，打造地理标志产品。把茶园、生猪养殖等种养业进行合理整合，建立低碳、低耗、循环、高效的农畜产品加工流通体系和区域农业循环利用机制，实施粮经饲统筹、种养相结合、农林牧渔融合循环发展。

(2) 探索“生态修复+保护开发”规律。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根据“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总体规划，推进城市绿地、湿地公园建设，坚持植树造林、山水保护、生态修复、功能提升统筹推进，以“河长制”为基础，加大中小河流域、大中型人工湖泊及山地、丘陵为重点的水源涵养保护区建设力度，从源头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强化重要水源涵养区的强制性保护和整治，加强水生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实施严格的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措施。构建优势互补的农业生产布局，从空间布局上解决资源错配和供给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建立因地制宜、就地生产、就近供应的主要农产品定期监测和动态调整机制。

(3) 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根据成都平原地区的生态区位优势，以稀缺的生态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社会资本为驱动力，统筹推进民族地区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引领成都经济发展与资源禀赋相匹配，逐步形成错位发展的生态产业格局，着力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绿色生态产业经济圈。建立促进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互动融合发展新机制，做美做精三圣花乡、平乐古镇、三道堰等核心旅游景区，推进旅游产业与特色农牧业、民俗文化、休闲康养融合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提升川西地区旅游竞争力。整合生态资源优势，坚持产、城、人、文融合推进特色民族村寨、中心特色小镇建设，要通过 PPP 模式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全面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4) 以环境硬约束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建立重污染产能退出和

过剩产能化解机制，引导企业通过改进工艺、提档升级，打造现代化、环保型企业，依法关闭超标排放、无治理能力企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环境质量，推动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以环境质量底线管理为抓手推动区域内移动污染源治理，科学制定污染减排措施，明确达标时间表、路线图。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建设生态沟渠、污水净化塘、地表径流集蓄池等设施，推进健康生态养殖种植，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农业有机循环发展。

(5) 完善生态与资源补偿机制。统筹推进成都全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以环保督察巡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落实地方环境保护责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创新，完善水污染防治、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补偿、自然保护区等相关制度。建立健全排污权初始分配和交易制度，落实排污有偿使用制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加强排污权交易平台建设。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落实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适时调整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政策，提高垃圾处理费收缴率，完善再生水价格机制等。探索资金、政策、产业及技术等多元互补，逐步实现森林、草原、湿地、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全覆盖，实现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制度化。

(来源于：《科技经济导刊》2018年第8期 龚贤)

红色龙岩的绿色发展之路

77.91%的森林覆盖率，连续38年领跑全省，作为福建省3大重点集体林区之一，当之无愧成为绿色中的绿色，让生态成为城市的名片。2012年起一系列国家级荣誉接踵而至，先后获评“国家园林城市”“2013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首届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2017年获“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更是锦上添花，它，就是地处福建西部的璀璨绿色明珠——龙岩市。这片神奇、神秘而神圣的绿色土地，是当年共和国的摇篮、著名革命老区、中央苏区。建设绿色龙岩、生态龙岩，是龙岩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战略目标。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龙岩努力打造“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山水一体，绿地连片”的城市特色，大做“显山、活水、造绿、便民”文章，大力实施“绿、亮、美”工程，构建层次丰富、格局完整的绿色发展之路。

龙岩的绿色发展，离不开龙岩一代代林业人呕心沥血，奋力拼搏发展林业、保护生态的实干精神。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闹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苏区优良传统，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以发展林业传承红色革命传统为抓手，把林业生态建设、促进绿色发展放在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力推进森林生态景观工程、森林生态修复工程、森林生态保护工程、生态富民产业工程、森林文化发展工程和森林城市创建工程等6大工程。为了让6大工程风生水起，龙岩林业人结合实际，不等不靠，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增绿，扩大森林面积，加快森林生态修复；一手抓护绿，最大限度减少森林资源消耗，不断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在推进森林生态景观工程战略中，坚持适地适树、乔灌草搭配、林果花结合，注重色彩多样化、生物多样性，打造“四季皆绿、四季有花、四季变化”的森林生态景观；大力开展“四旁四地”种植珍贵树、乡土阔叶树活动和绿色乡镇、绿色社区、绿色学校创建活动；推进长汀全国生态文明、现代林业建设示范县和美丽乡村建设。在森林生态修复工程中，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实施大造林，每年都超额完成全年造林绿化任务。为解决森林蓄积量较低、森林质量较差的问题，实施森林生态修复工程突出进行水土流失治理，重点完成水土流失区造林；突出林分结构改造，营造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

使阔叶树造林面积超过针叶树；突出森林生态修复，完成森林生态修复近一百万亩；突出营造生态林，改变过去以营造商品林为主的格局。在实施森林生态保护工程中，每年都会开展集中打击涉林违法犯罪专项整治。2012年，龙岩在全省率先出台暂停天然阔叶树采伐的规定，组织开展打击非法采伐天然阔叶树专项行动，关停木材经营、收购、加工单位129个。在实施生态富民产业工程中，龙岩市把改善民生作为林业发展的“催化剂”，大力发展非木质利用产业，依靠科技进步，加快绿色发展，实现不砍树也致富，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扶持推进林业企业上市。在实施森林文化发展工程中，大力推进“森林人家”乡村旅游、华南虎保护工程。在实施森林城市创建工程中，举全市之力把这项民心工程真正落到实处，由时任市长担任“创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成功跻身国家森林城市。2012年7月，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在龙岩市长汀县召开，这既是龙岩历史上召开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林业会议，也是对龙岩绿色发展的肯定和褒奖。

龙岩市的绿色发展，离不开长汀县的水土流失治理，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给龙岩的绿色发展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程。长汀，作为龙岩市辖区的一个县，曾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客家首府、红色苏区、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而闻名遐迩。如今，长汀再度声名远播，从“水土流失冠军”到“水土治理典范”，被专家誉为南方水土流失治理的典范。曾经，长汀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份之一，水土流失历史之长、面积之广、程度之重、危害之大，居全省之首。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长汀水土流失面积便居全省之首。“长汀哪里苦？河田加策武。长汀哪里穷？朱溪罗地丛。”这是上世纪初中期在长汀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山光、水浊、田瘦、人穷”是那时以长汀河田为中心的水土流失区生态恶化、农民生活贫困的真实写照。长汀水土流失重灾区河田，原名柳村，因

水土大量流失，大面积的崩沟塌河，河与田连成一片，山崩河溃，满目疮痍，形成“柳村不见柳，河比田更高”的景象，后人遂称之为河田。因河田属于红壤区，四周山岭尽为赤红色，像一簇簇燃烧着的火焰，故而又得名“火焰山”。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环境极为恶劣。一旦连续暴雨，便见洪水滔滔；雨停水歇后，又露沙见底。“晴三天，闹旱灾；雨三天，闹洪灾。”据1985年的卫星遥感普查资料显示，长汀县水土流失面积达146.2万亩，占该县国土面积的31.5%，长汀成为中国四大水土流失严重地之一。

为了改变困境，长汀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水土治理工程，弘扬“滴水穿石，人一我十”的长汀精神，持续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恢复植被。为了积极发动广大群众，长汀县提出了“守土有责，寸土必争”的目标，打响了一场大规模治山治水奔富裕的“持久战”，并将治理水土流失治理形象地概括成两句话：“斧头收起来”“锄头扛起来”。“斧头收起来”就是实行严格封禁，是治理水土流失的“牛鼻子”。2000年，时任长汀县县长的黄福清签发了《封山育林命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汀县仅有的两个县长令之一。与此同时，长汀县制订了《关于护林失职追究制度》以及严格生态保护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组建县、乡、村健全的护林网络，护林人员由过去单一巡山改为进村入户查灶头。建立群众燃料补助制度，引导农民以煤代柴、以沼代柴、以电代柴，对封禁区群众给予燃煤价差补贴、沼气池建设补助。据统计，近年来河田水土流失区内共建有沼气池11465个，近1.3万户群众告别了做饭烧柴草。“锄头扛起来”就是进行产业开发。长汀以人为本，把治山和治穷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开发性治理的新路子，做到治理水土流失与治穷相结合、与发展绿色农业相结合、与发展生态工业相结合。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激发活力，在水土流失区发展果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推进产业发展与水土流失治理的有机结合，以生态恢复带动群众致富。采取减免税收、厂房贴租、

成本供地、优化环境、服务靠前等一系列措施，让利吸引企业到长汀投资办厂，组织水土流失区过剩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减轻水土流失区农业人口对生态的承载压力。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长汀创新了资金补助模式，以奖代补，即大干大补、少干少补、不干不补。鼓励公司、农户租赁承包山地种茶种果，经营权30年不变，并通过补助，以优惠条件“四两拨千斤”吸纳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开发治理。

在长汀的水土治理工程过程中，离不开一任又一任省领导接力式的强力推动，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持续给予强力的政策扶持。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福建省长习近平先后多次到长汀调研考察，对水土治理作出重要批示。从2000年开始，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福建省政府列为全省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每年由省级有关部门扶持1000万元资金。30多年来，长汀县始终坚持水土治理与治穷相结合、与发展绿色产业结合，着力把低质低效的水土流失地建设成优质高效的果园。农民包山治理水土的积极性被广泛调动，过去的砍树人，变成了种树人，终于将大片大片的“秃头山”“火焰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满山”“花果山”。改善了生态的同时，摘了贫穷的帽子，实现了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发展并重，治理和改善民生并举。从“水土流失冠军”到“水土治理典范”，从“山光、水浊、田瘦”到“山肥、水美、田丰”，长汀全县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7.8万亩，治理区植被覆盖率由15%~35%提高到65%~95%，全县森林面积增加了近100万亩，达370万亩，减少水土流失面积63.3万亩，有9个乡镇、22个小流域、118个村、21万人得到实惠，红土地上的百年绿色梦想正在成为现实。如今的长汀，特别是水土流失区，一座座青山、一处处果园、一块块良田、一条条江水，无不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昔日“火焰山”的“火焰”相继熄灭，成了花果飘香的“花果山”。多年不见的白鹭也重归溪河觅食、嬉戏，一幅美不胜收的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动人画卷呈现在当地人面前。2012年初，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做出重要批示，予以肯定。由此，被称为“长汀经验”的水土流失治理做法向全国推广。

龙岩的绿色发展，同样离不开“全国林改第一县”武平县敢为人先、绿色崛起的好生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源地。他们以深化林改为突破口，让荒山育成“绿山”，让农民捧上“金山”，让发展有了“靠山”，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美和百姓富的有机统一。这场被称之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的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源于武平，开启了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先声，探索出一条推进绿色发展的康庄大道。十几年来，林农林权明晰到户，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国家得绿，林农得利”。如今，人与森林和谐共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武平早已深入人心。林下经济生机勃勃，“不砍树也能致富”已走进现实。

武平县林改是现实问题倒逼出来的。21世纪初，林业发展“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入、林业产业难发展、望着青山难收益”等“五大难题”困扰着武平，这在当时也是全国林业的普遍困境。“五难困境”，根在集体林权制度。为了破解这个难题，2001年6月，武平开启了一场自我革命，选择捷文村为试点，把集体林均山到户，颁发了全国第一本新版林权证，随之形成了以“四权”，即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武平林改模式。这个做法在当时既没有上级授权，也没有法律依据、更没有经验可借鉴，武平全县上下压力巨大。

在这进则全胜、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武平调研，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历史性决定，为林改一锤定音。

武平林改经验由此逐步向福建全省、全国铺开。武平最早提出的“四权”等林改模式被吸纳进中共中央、国务院2008年6月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成为国家林改举措。随后，武平县继续在全国率先探索实行林权抵押贷款、商品林赎买机制、兴林扶贫等系列配套改革，极大激发了群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广大林农已从采伐经营林木为生的“砍树人”转身为发展林下经济“护绿者”。“来武平，我‘氧’你”的时尚口号广为传播。林改催生武平好生态，林改16年来全县累计造林面积71.5万亩，已超过林改前25年的总和，森林覆盖率达79.7%，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县城”“中国天然氧吧”“国家绿化模范县”“全国封山育林先进县”等荣誉称号。如今，“生态立县，绿色崛起”成为武平县的发展战略，绿色发展理念已深植当地干部群众心中。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还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一座“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生态文明城市正生机勃勃地向我们走来。

龙岩市的绿色发展，还离不开一支护林“铁军”——森林公安。在闽西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森林公安队伍，是保护龙岩市130多万公顷森林资源和众多野生动植物的主力军，他们以林为业，以警为荣，大力弘扬古田会议精神，继承和发展优良，以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态建设成果为核心，严厉打击各类涉林违法犯罪行为，为推进闽西绿色发展、建设美丽龙岩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全市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龙岩市是全国重点集体林区、福建省三大林区之一。全市林业用地面积2363.1万亩，占土地面积的82.7%，其中有林地面积2177.3万亩，活立木蓄积量1.17亿立方米。现有生态公益林702.2万亩，占林地面积的29.7%；商品林1660.9万亩，占林地面积的70.3%。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个、保护小区455个、国家级森林公园4个、省级森林公园7个，生

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达 170.2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6%。丰富的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让不少违法犯罪分子时刻觊觎闽西这片山林，甚至为经济利益不惜铤而走险走上涉林犯罪道路。为保护森林资源、维护林区治安和谐稳定，在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常年忙碌奔波着一支队伍，这就是被上级赞为“红土地上能打硬仗、能打胜仗”的森林公安队伍。红土地上的森林公安民警，发扬革命老区精神、作风和传统，不畏难、不言苦，忠诚履职，勇于担当，敢于亮剑，值班备勤、巡山防火、法制宣传、现场勘验、侦查追捕。工作量大，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部分民警积劳成疾，倒在工作岗位上，践行了为绿色奉献、为警徽添彩的誓言。队伍的忠诚和尽职，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群众的满意，相继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先后荣获“全国林业严打整治斗争先进集体”“森林资源保护十佳单位”“全国打击破坏森林资源专项行动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2015 年底龙岩市森林公安局被国家林业局表彰为“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先进集体”，市局闽楠专案组和上杭县森林公安分局被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记集体二等功一次，2016 年底原局长邱荣华荣立个人一等功，2017 年 5 月，上杭县森林公安分局李国梁局长被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来源于：《森林公安》2018 年第 3 期 兰春福）

皖南地区绿色发展探讨

皖南地区以地理位置划分，特指安徽长江以南地区，包括黄山、池州、宣城、芜湖、马鞍山、铜陵等 6 市，共 21 个县（市、区），国土面积 36536km²，约占安徽省国土面积的 40.8%。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治国方略，对绿色发展进行了详细论述，明确提出“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把生态环境保

护和绿色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施绿色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具体实践。

1 皖南地区实施绿色发展的优势和必要性

1.1 优势。一是自然生态优势。境内有九华山、黄山和天目山，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河流有长江、新安江、青弋江、水阳江四大水系，生态环境优良，其中宣城市是安徽唯一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安徽省统计局、发展改革委、环保厅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显示，2016年度各省辖市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前5位的市分别为芜湖、黄山、马鞍山、宣城和合肥，其中皖南地区占4位，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皖南地区实施绿色发展的基础。二是区位优势独特。皖南地区紧临长三角和长江黄金水道，是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经济辐射的“桥头堡”，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皖南地区在绿色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主动对江浙沪获得相关支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2 必要性。安徽是最靠近长三角的中部省份，是长三角的“后花园”，皖南地区无疑是“后花园”的核心地区，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皖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好坏对长三角区域的生态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实施绿色发展，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对整个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实施绿色发展是克服发展短板，加快推进自身发展的需求。皖南地区绿色经济体系尚未健全，部分城市产业结构单一，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绿色制造水平还不高，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比较低，绿色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实施绿色发展行动，将更加高效推动皖南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2 皖南地区实施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绿色发展的主动意识不强。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各

级党委政府的共识和行动，但认识还不深、还不透，少数干部群众自满于自然禀赋优越，存在轻保护、重发展的思想，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发展价值取向上仍存在片面地追求 GDP 的思想；一些企业环保意识较差，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现象时有发生；广大群众还没有尝到绿色发展成果的甜头，注重自身小环境较多，生态保护意识还有一定差距。

2.2 绿色发展协调性不够。皖南地区各市虽然均成立了绿色发展专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制定了绿色发展行动实施方案，但由于各地绿色发展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环保部门，导致各地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各部门之间未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

2.3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皖南地区各市绿色产业的底数不清，现状也没有全面调查，缺乏绿色产业发展整体规划，导致下一步推动绿色发展的精准性不足，政策措施针对性不强。皖南地区除芜湖市和马鞍山市外，历史上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步伐不快，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偏弱。另外，皖南部分城市高耗能产业占比依然较高，新兴产业占比不高，如宣城市 2016 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完成增加值 158.4 亿元，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比重为 36.8%，较全省占比高 9.9 个百分点。

2.4 市场体系不够健全。绿色发展主要还是依赖于政府推动，缺乏对绿色产业的统筹引导，绿色发展的市场机制不完善。除部分地市旅游品牌较响外，绿色产品不多，亮点不靓、品牌不响，绿色竞争力不明显，导致“金山银山”效益未显现。

2.5 绿色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绿色设施保障功能不健全，县乡环境治理设施建设滞后，污水管网建设不到位，设施运行不正常。

3 皖南地区推进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大力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没有优良的

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基础，绿色发展就是空谈。皖南地区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改善压力很大，甚至有恶化的风险，如芜湖市2018年1月至8月初PM_{2.5}浓度为54.4 μg/m³，较2017年同期45.3 μg/m³增加20.1%，优良天数同比减少9.2%。因此，皖南地区必须坚持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按照安徽省政府制定的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方案，全力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推进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强化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以建制镇、乡集镇和中心村为重点，因地制宜建设低成本、易管理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管理，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推行一系列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机制，大力开展林业“增绿增效”行动，强化绿色生态屏障功能。

3.2 制定绿色发展的总体规划。皖南各市要做好绿色经济发展顶层设计，推进“多规合一”，优化生产、生活、生态布局。完善皖南地区市、县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划定和严守生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优化各类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统筹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促进形成功能清晰、协调有序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3.3 加快发展绿色产业，推进绿色经济体系的形成。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从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着手，推动产业变绿，绿变产业。

3.3.1 积极打造绿色制造基地。促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大力推广应用循环生产方式和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推进资源再生利用和再制造产业发展。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标准为引领，建设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四位一体的绿色制造体系，争创国家级绿色园区，加快形成政府为

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的推进绿色制造工作格局，打造长三角绿色制造基地。

3.3.2 加速发展现代绿色农业。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生态+”方向，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合理使用化肥农药，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的使用，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提高化肥使用率。实施畜牧业绿色发展工程，全面开展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区创建活动。积极发展体验型、观光型休闲农业，加快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3.3.3 大力发展生态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提升，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打造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服务消费品牌，如宣城市正在打造皖南养老休闲城市、旅游目的地城市和中国文房四宝之城等。加速互联网与现代物流等相关领域联动，与生态旅游、养老、教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速融合发展。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交通，推进绿色出行。完善公共交通、自行车等绿色出行体系，规范发展网约车，构建多样化、差异化出行服务体系。

3.3.4 发展绿色清洁能源。建设安全稳定清洁的现代能源体系，清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加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推进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提高电煤在煤炭消费中的比重，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3.4 拓宽绿色发展投融资渠道。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的转移支付、环保专项资金支持。发展“绿色金融”，开发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支持污染防治、绿色低碳循环、节能减排、生态示范创建等绿色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推进与央企、民企、外企业的合作，对绿色产业和生态建设项目在用地指标、基础配套、资金贷款、项目审批等给予优先安排。

3.5 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培育绿色生活理念。大力推进绿色消费

和低碳生活理念，加快形成低碳消费的生活方式。广泛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大力传播生态文化理念，把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知识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和校园教育体系、成人继续教育体系，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增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认可与价值追求。充分利用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地球日、中国植树节、全国土地日、低碳日等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养成绿色思维、绿色行为、绿色习惯，形成“人人都是节能主体、个个都是绿色卫士”的良好氛围。

3.6 完善工作机制。健全工作机制和保障体系。系统梳理和优化整合推动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重点是财政、金融、投资、人才等方面政策，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明确牵头部门责任，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制定绿色发展考核指标体系，针对辖区各地开展共同但有区别的绿色发展考核，更好地体现政策上的协调和公平。

（来源于：《安徽农学通报》2018年第19期 桑忠营 陈晓洁）

高质量绿色发展仙居实践

让乡村乡愁乡野更加美丽

——仙居县域绿色发展路径探索

仙居县地处浙江省的东南，是台州市的内陆县，面积2000平方公里，八山一水一分田，总人口51万，辖20个乡镇（街道）。2017年，仙居县实现生产总值211.1亿元，财政总收入30.5亿元，是浙江省89个县（市、区）中需要加快发展的26个县之一。

仙居需要加快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工业发展水平的落后。与此同时，仙居的自然条件约束明显，八山一水一分田，可供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总量很有限。仙居还是浙江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地处灵江上

游，环境容量有限，对投资的环保要求较高，提高了本土企业上项目和招商引资准入门槛。

如何在环境约束和工业落后的双重制约下求发展？仙居结合自身的生态优势、文化背景和产业基础，在“生态”两个字上做文章，着力乡村绿色发展，激发后发赶超潜力，在县域绿色发展路径上做了一些探索。

仙居历史悠久、生态优越，旅游资源丰富，最典型的代表是5A级景区神仙居，正是李白梦中神往的天姥山所在地。同时我们也深知，仙居工业落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乡村发展事关仙居发展大局。

在不断发展探索实践当中，我们深刻认识到，乡村发展正面临着一场历时性的大变革。这种变革不是传统意义上人居环境的简单改善，而是由内外环境共同催生的一场内生性变革。

仙居围绕建设环境优美、文化和美、乡野趣美、经济富美、民风纯美的要求，打造“五美乡村”，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绿色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我们在探索乡村绿色发展上突出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环境优美的居住空间，着力呈现“粉墙黛瓦、绿树红花、小桥流水人家”的绿色村居景象

首先，高起点规划村居。科学编制乡村规划，探索出了异地搬迁型、环境提升型、产业依托型等模式。携手中国美术学院共同合作成立了仙居乡村振兴学院，为美丽乡村品质塑造提供智力支撑。

第二，高标准整治环境。近三年来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全覆盖，被评为2017年度浙江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县。尤其是从2014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人畜分离，拆除了区域内村庄里所有的散户养殖猪（牛）栏6万多个。引导每个村搞集中养殖小区，在不影响村民增收的基础上，为全域旅游打

下了农村整洁环境基础。

第三，高标准扮靓家园。2011年起规划了492公里长的全域滨水绿道网，提出全域景区化。目前已经建成了城乡和田园绿道196公里，成为了居民和游客亲近山水、休闲运动的时尚场所，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世界休闲组织国际创新奖。2012年7月，仙居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河道管理河长制，全面禁止垃圾入河、污水直排、河道采砂和两岸违章搭建，恢复了4条千年古堰，修复改造270个村庄的水系，重现了活水穿村的美丽景象。

注重历史传承，打造文化和美的心灵空间，让乡村成为承载乡愁的情感归宿地

首先，用建筑形态展现乡愁常态。建筑是凝固的乡愁。针对多年以来仙居农村建房的乱象，挖掘提炼了仙居建筑的元素，对农村新建房屋提供了60套建房图样，在风格、高度、密度等方面严格把关。同时加强了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个，中国传统文化古村落31个。

第二，用民俗文化推进乡愁活化。民俗是流动的乡愁。仙居充分挖掘本土非遗民俗文化，以及特色传统工艺和生活习俗，加强传承与创新，形成了“安岭斗茶节”“清音寺庙会”“上张年货节”等各具特色的民俗活动，保护针刺无骨花灯、彩石镶嵌、九狮挪球等特色文化传承。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50家，充分发挥其展陈、活动、服务等功能，定期举办群众喜闻乐见、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实现乡村农民的“精神富有”。

第三，深挖资源，扩大乡愁资产。乡愁是潜在的财富。仙居成立了美丽经济投资公司，建立了“美丽乡村实验室”，挖掘农村“沉睡”资产。例如，把古树名木、古村名居、古道古堰、岩画石刻、牌匾圣旨等368件纳入“绿色资产”清单，严格保护起来。对一些自然条件优越的空心村，由美丽经济投资公司率先收储，创造条件引进工商资

本，进行保护性的修缮、开发与利用。例如仙居的裸心居项目，计划投资15个亿，修缮开发一条峡谷8个空心村。

突出全域视野，打造乡野趣美的休闲空间，形成“众星拱月、月照群星”的全域景区格局

首先，大力打造乡村旅游的全域空间体系。根据《仙居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狠抓精品村、景区村创建，打造了九都风情、秀溪锦港等5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创成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6个、省市特色精品村19个、景区村庄70个，为游客展示诗意乡野景象。

第二，大力打造乡村旅游的综合大平台。出台《美丽田园综合体创建导则》，秉持特色、创意、生态、融合原则，努力打造6个集农业、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让游客在田园采摘中，体验“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农耕乐趣。全国有29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其中有一个就在仙居，仙居台创园的梦幻田园综合体已通过4A级景区景观资源评审，入选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全国农业农村创新园区，引进项目32个，园内海亮集团有机蔬菜更是成为2016年G20杭州峰会特供蔬菜。

第三，大力打造乡村旅游的特色景致。注重农旅融合，以节庆带活乡野田园，成功举办21届中国仙居杨梅节、11届浙江油菜花节、仙居江南牡丹节、荷花节、薰衣草节、荞麦花节、向日葵节等，几乎每月都有以花、果为主题的农业节庆活动，打造“四季花海”。杨梅观光带、油菜花观光带、向日葵景观带入选“中国最美田园”。着力打造匠心独具的休闲民宿，推动产业标准化、精品化。

强化经营理念，打造经济富美的创业空间，激活要素、激活主体，为乡村振兴增添发展活力

首先，强化特色，激活产业。统一以“神仙居”品牌推广特色农产品，增强区域优势农产品识别度。全面实施示范性农业全产业链“二二三”提升工程，即5年内建成两条10亿元（杨梅、仙居鸡）、两

条5亿元（油料、华统养殖）、三条1亿元（中药材、绿色稻米、特色干鲜果）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效应，让农民获得全链条和品牌带来的增值收益。尤其是仙居杨梅，品牌响亮，有中国杨梅在浙江，浙江杨梅属仙居的美誉。杨梅种植面积13.8万亩，今年产量达9万吨，仅杨梅鲜果销售值就达6.7亿元，带动全县农民人均增收1700余元，杨梅节带动全县旅游总收入达8.3亿元。杨梅已开发出杨梅酒、杨梅原汁、杨梅酵素、杨梅果脯等30多个产品。

第二，强化改革，激活要素。深入推进“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成立了浙江省首家股份合作农场和浙江省首个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系统。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创新推出“丰收小额贷款卡”，根据信用授予农民免抵押的小额贷款，已累计发放小额贷款卡6.4万张，贷款24.7亿元，有效推动农民创业创收。

第三，强化引育，激活主体。大力引进包括中国乡村复兴基地等4个国字号品牌在内的17个创客项目，让创客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力。大力实施“乡贤回乡”“外出创业人员回归”“学子回引”等“三回工程”，引回投资额1000万元以上项目80多个。强化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加快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搭建了600多个农村电商服务站点，连续四年入选中国电子商务百强县。充分依靠发动群众，创新“投工投劳、捐款捐物、认领认养”模式，让群众共建共享乡村振兴。

创新“三绿模式”，打造民风淳美的治理空间，巩固和完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首先，充分发挥基层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深入开展村级“和合好班子”创建活动，全县有121个村成为“和合好班子”；开展“我是党员我带头”主题党日活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克难攻坚。从严规范管理村干部，出台《仙居县不称职村社干部“停职教育”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获得广泛认可并在浙江省推广。

第二，全面铺开“三绿”治理模式。探索开展以“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方案，通过党员示范带头、群众深度参与等方式，激发了干部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增强农村善治内生动力，“三绿清单”乡村治理模式得到了浙江省委的肯定，也被人民网评为2017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最佳案例。

第三，致力打造“最温暖志愿之城”。全县有志愿者组织300多个，活跃志愿者达3万多人。民间山地应急救援队，因为表现突出，成为了省级红十字应急搜救队。仙居也是“中国慈孝文化之乡”，“慈孝仙居”创建获浙江省公共管理十佳创新奖。为解决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的就餐问题，仙居建了遍及全县200多个村庄的“6199”食堂，实现了邻里守望。遍布全县各乡镇的“爱心小屋”收集捐赠二手物资，将“微爱心”汇成“大暖流”。

经过多年的努力，仙居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12年的2.43缩小到2017年的1.94，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明显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幅，而且都是高位运行在9%以上。仙居成为中国最佳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国家级美丽乡村标准化试点，获评浙江省首批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2015年，浙江省把仙居县列为全省唯一一个绿色化发展改革的试点县。2018年，仙居成了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的百强县。

（来源于：《中国生态文明》2018年第5期 林虹）

仙居美丽乡村建设“绿色化”发展路径的思考

近年来，浙江省仙居县紧紧围绕“绿色发展、科学跨越”主题，积极推进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加快绿色经济发展、绿色城乡融合发展、绿色人文培育等工作，初步构建了生态型战略体系，探索既能加快发展，又能保护绿水青山的绿色化发展之路。

1、基本现状

(1) 绿色创建模式形成共识。根据县域特征、产业特色和人文特点，创建形成了本土化的、充满诗意的“人间仙居·美丽乡村”地域品牌，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仙居实情的、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基础，着力构建农旅融合、“粉墙黛瓦、绿树红花、小桥流水人家”的农村风貌的创建模式。

(2) 城乡绿色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在加快城区“山水画城市”规划设计和改造推进的同时，农村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推进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利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垃圾分类减量等工作。相继有12个村被命名为台州市级美丽乡村精品村；有3个村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重点村、12个村被列为一般村；有490个项目村（点）开展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新增受益农户7.2万多户；20个乡镇（街道）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等有效实施。

(3) 绿色经济发展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注重美丽经济和乡村休闲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主导特色产业13.8万亩杨梅给农民带来了5亿多元的收入。每年的杨梅节、油菜花节、荷花节、牡丹花节、马鞭草节等农事节庆活动，带旺了农家乐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仅今年上半年全县农家乐营收就达到6112万元。“火红杨梅生态采摘一日游”“亲子踏春二日游”成功入选全省30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四季花海”景观品牌逐渐形成。

(4) 绿色人文培育颇具成效。通过实施“增收”“保障”“救助”“督孝”等帮扶行动，全面开展了消除全县4719户10997人“4600元”以下低收入群体行动。把传承和发展慈孝文化作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抓手，大力推进“慈孝仙居”建设，慈孝之风盛行乡村，提升了乡风文明和人文精神。

(5) 绿色改革不断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县域绿色化改革、“三

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试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集体经济股改等稳步推进，激发了农村绿色发展的活力。

但是，也存在着县域总体绿色化发展布局不清晰，投入的局限性制约了美丽乡村精品打造和品牌建设，美丽经济发展块状特色不鲜明等问题。

2、对策建议

(1) 要坚持城村景一体，做好村庄规划设计，着力打造全域协调的美丽乡村建设格局。要按照“全域景区化”的要求，统筹考虑仙居“中国山水画城市”建设和美丽乡村“规划科学布局美”，突出规划设计，优化规划体系，注重有机结合，把美丽乡村规划与村庄布局规划、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现代旅游规划、农业规划等有机衔接，科学编制美丽乡村规划，突出“一乡一品牌、一路一景观、一村一特色”“村新、业兴、景美、人和”建设目标，形成“粉墙黛瓦、绿树红花、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乡村风貌和绿色发展路径。

(2) 要坚持建保创并重，推进村庄有机更新，着力打造富有“仙”“居”特色的美丽乡愁。一是要以打造绿色村居为引领，大力发展绿色生产，营造绿色环境，倡导绿色生活，培育绿色人文。积极开展绿色村居建设规范编制，创建“绿色公约”，推进绿色产业发展等系列行动，引导产业、村居、人文不断向绿色化发展。二是要加强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利用。要坚持“文化为魂”，积极开展古祠、古树、古桥、古道等历史文化遗迹遗存的保护利用，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三是要探索多元建设模式。一方面，要根据“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和农村实际，创建一批“休闲养生乡村”“创意农业乡村”“山水田园乡村”“千年古韵乡村”“现代宜居乡村”等特色乡村，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韵”。另一方面，要强化城乡统筹规划设计，抓好楼层控高、风格协调，力求保留乡村韵味，导入新业态，拥有新功能，使美丽乡村从“一处美”向“一片美”“全域

美”转变。

(3) 要坚持农旅文融合，抓好村庄经营管理，着力打造富民惠民的美丽经济。一是要做好主导产业之“特”文章。以“一园两区”（台湾农民创业园、现代农业园区和粮食功能区）建设为抓手，构建各具特色的产业链，着力打造仙居杨梅、仙居鸡、茶叶、笋竹、绿色稻米、中药材和高山蔬菜等产业，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村+农户”的产业模式，形成一批特色村、专业村。二是要做好农旅融合之“美”文章。把“全省美丽乡村创建工作先进县”和“全省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县”紧密结合，以生态旅游为粘合剂，通过产业互动融合发展，实现共促提升。通过举办杨梅节、油菜花节、荷花节、牡丹花节、马鞭草节等农事节庆，带动小品种成为大产业，把小题目做成大文章，促进农家乐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三是要做好农民增收之“路”文章。其一，要加快“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形成，通过更多的杨梅村、水蜜桃村、樱桃村、提子村、油茶村、三黄鸡村、茶叶村、高山蔬菜村、灯笼村、来料加工村等，促进农民“业内”增收。其二，要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工商资本、知识青年、农民依托景区资源和山水优势，积极发展精品、特色民宿，让人游在神仙居、玩在神仙居、住在神仙居。通过加大工商资本的引进力度，把环神仙居景区打造成新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创新样本。要利用好“互联网+”，深化农旅融合文章，定制符合个性化需要的农产品，大力推动电子商务、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业态的融合，以“民宿圈”带动“经济圈”繁荣。其三，要着力解决好低收入农户增收“短腿”问题。通过精准扶贫，结对帮扶，实施“增收”“保障”“救助”“督孝”等帮扶行动，全面消除“4600元”以下低收入群体。其四，要加强农民素质提升培训。结合美丽乡村、农家乐和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通过主题精品班、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和农民大学生培养，提升农民创业就业水平。

(4) 要坚持清改绿共推，强化村庄基础建设，着力打造低碳的绿色生活。要充分依托美丽乡村建设，通过环境综合整治，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人畜分离、绿化美化等举措，激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夯实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营造农村绿色低碳洁净生活，重点是推进“清、拆、改、绿、建”。“清”即彻底清洁村内道路、门前屋后、公共场所、卫生死角，对清淤疏排水沟、灌渠、池塘等。“拆”即拆除临街、房前屋后违章建筑、露天粪坑、畜禽圈舍、草籽缸等，清理有碍村容村貌的残墙断壁等。“改”即对村庄外围视线内房屋，进行房屋立面粉白、改建马头墙，形成白墙黑瓦的效果；改造村内水系，打造节点水景观；平整拓宽村内道路。“绿”即利用拆除后农户的房前屋后见缝插绿，栽植花草树木，建设休闲绿地等。“建”即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等机制，有效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5) 要坚持机制创新，深化村庄内部改革，不断激发美丽乡村建设活力。一是要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推进土地经营权、宅基地确权赋权和村经社股份制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权益。尤其是要深化全省“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建设试点，拓展延伸县级与协作区农合联功能，强化生产、供销、信用三大服务功能的提升，更好地实现对接农民需求和强农惠农富农。二是要发动全民参与建设。要善于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充分用好群众之智、群众之力，创造更多的“土办法”、新经验，让群众共建共享美丽乡村。三是要形成层层争创氛围。要把示范引领作为最直观、最有效的手段，选树身边的典型、眼前的榜样，用竞赛催人、激励人。在县级层面、村级层面以及干部层面，通过竞赛激励、典型树立等活动，推出一批“可看可学可借鉴”的村居，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四是要发挥资金引导作用。要发挥财政四两拨千金的作用，通过以奖代补撬动金融单位和民间资金的投入及村级自筹，强化美丽乡村建设的资金保障。

(来源于：《新农村》2018年第8期 李建群 徐梓辉)

浙江绿色发展 “仙居绿” 勇立潮头

绿道串联起两岸无数绝美的自然风光，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是全球火山流纹岩地质遗迹的典型，公盂景区被誉为华东香格里拉，200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包罗万象，一路原生态的青山绿水，令人流连忘返。这里就是仙居县，浙江省的“生态宝地”。

绿在生态，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位于浙江省东南部、长三角经济圈南翼的仙居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

近年来，从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县到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公园试点县、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从中国慈孝文化之乡到美丽中国“十佳旅游县、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县和浙江省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县等荣誉的获得。仙居人，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绿色跨越和突破，在我国绿色发展的时代大潮中，焕发出光彩靓丽的“仙居绿”……

统计显示，仙居全县森林覆盖率达79.6%，水质达标率100%，空气质量达标率为96%以上。据浙江省科学院测定，景区内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区域值每立方厘米达8.8万个，平均值每立方厘米达2.1万个，比室内高200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近年来，依托永安溪良好的生态资源，仙居又高起点地谋划了绿道综合开发。它是一条集环保、运动、休闲、旅游等各种功能的生态绿道，绿道网遍布全县2000平方公里，总长达492公里。2016年仙居绿道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据了解，目前仙居已建成永安溪绿道、盂溪绿道、朱溪港绿道，以及各类田园绿道达100多公里。仙居绿道连接起了城市公园、自然保护区、现代农业园区、城乡居民区等，组合了游憩型、自然生态型、风景名胜型等各类绿道功能。它不仅为

人们提供舒适旅居环境，也为植物生长和动物繁衍栖息提供了空间，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此外，还有国内最大的亚热带原始沟谷常绿阔叶次生林保护区之一的淡竹休闲谷，其总面积 130 平方公里，分溪谷休闲区、科普观赏区和森林探险区三大主要功能区。谷内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完整多样的生物圈，拥有 2000 多个生物种类，享有“绿色基因库”和“天然药物宝库”之美誉。

绿在田园，昔日耕地成“童话仙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站在绿树掩映、金色花海此起彼伏的 5 万亩油菜花田中，已找不出原貌，昔日农村耕地现已成为“生态旅游+乡村振兴”的“童话仙境”。记者看到，被油菜花肆意妆点的花田间，蜂飞蝶舞，花团锦簇，炊烟农舍，溪流山峦，构成了一幅悠闲的乡村春景图。欣赏风景的人们络绎不绝，在斜风细雨中，纷纷拿出相机、手机进行拍摄，想要将这恍若仙境的油菜花田中的美景留住。

基于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和农业产业基础。近年来，仙居县大力发展以四季彩色景观农业为主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通过连续举办油菜花节、桃花节、牡丹花节、杨梅节、荷花节、葵花节、菊花节、荞麦节等农事节庆活动，实现了产业的有效融合，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特别是仙居·浙江油菜花节，自 2008 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十届，每年吸引游客百余万人次。历届油菜花节围绕“油菜花开、浪漫乡间、美丽心情”、“美丽乡村、童话仙居”等不同的活动主题，举办了中国相亲大会、春日踏歌、“稻草人——花田创意”制作大赛、“拥抱春天、放飞希望”亲子放风筝活动、“低碳仙居”地方美食等活动。

而今年的油菜花节，则有五大亮点精彩纷呈。以“1+3”的模式，

体现仙居全域旅游和仙居各乡镇油菜花节的特色。种类繁多，在往年传统的花田稻草人的基础上，推出了花田旗袍秀、花样年华服装展示、花田音乐会和花田诗会等系列活动。体验趣味多，以“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振兴”、“旅游+运动”的形式，不仅有很多传统手工艺品体验活动，同时还有乡村民俗、农耕展示，增强游客在花田中的互动体验感。特色美食和特色旅游商品，让大家体验了一个“旅游+文化+民俗+农产品+工业”的多元化、多产品的“农旅”。

绿在发展，打造生态工业高地

仙居，不仅是浙江的“生态宝地”，也是全省的“经济洼地”。曾经是浙江 26 个欠发达县之一，如今一跃成为了该省生态文明的先行区，绿色发展的样板区。

作为全省唯一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和省首批生态工业发展试点县，仙居县顺应绿色化发展新潮流，切实发挥独特生态优势，以“资源减量化、生产循环化、废物资源化”为着力点，全力打造生态工业高地，走出生态工业发展的“仙居模式”。

以绿色为引领。自仙居被列入生态工业试点以来，坚持“生态优先、创新驱动、智造支撑、融合发展”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进生态工业发展。2016 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 358 亿元，同比增长 13.65%，其中规模以上产值 149.33 亿元，同比增长 7.9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6.77 亿元，同比增 10.2%，比台州市平均增速高 1.9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仙居县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0.8 亿元，同比增 13.6%，增速排名全市第一。

同时，还把生态工业发展理念贯穿到工业发展全过程，协调好保护生态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加快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通过制定绿色企业公约，开展绿色企业创建、重点扶持生态工业项目建设、“绿色化发展改革论坛”等方式，普及生态工业发展理念，在全县上下营造出一种促进生态工业发展的良好氛

围。2016年仙居绿色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47.52%，比2015年提高2.52个百分点。

以改革为突破口。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审批服务快速高效、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充分释放政策红利，从根本上提升发展动力，实现生产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以改造提升为关键。发展生态工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使之符合生态工业要求是关键，也是难点。通过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构建循环型产业链，鼓励企业加强“产前”“产中”控制，全面导入清洁生产体系，变开放式生产、粗放式生产为封闭化、精细化生产。

以发展评价为导向。建立生态工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发布《仙居县生态工业发展综合评价办法（试行）》和《仙居县乡镇（街道）生态工业发展综合评价办法（试行）》，每年组织一次生态工业发展评价活动，并编制《仙居县生态工业发展综合评价报告》，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认清生态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并为完善政策、推动部门工作提供一定依据。

（来源于：《中国科技财富》2018年第4期 胡利娟）

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中的协同治理与路径完善

——基于仙居县的实证研究

一、序言

仙居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思路，对绿色化发展进行了持久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四大战略、五化同步、六张名片”的战略举措，提出建设“中国山水画城市”的绿色发展目标。2015年，仙居县成为浙江省首个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县。试点两年来，仙居全县上下坚持“绿色发展、科学跨越”，通过全域谋划、全民动

员、全面推进，将绿色化改革进行到底，全力打造经济强、体制活、环境优、城乡美、百姓富的美丽中国样板区。仙居县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六个率先”：在全国县级率先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全覆盖；在全国率先实施河长制；率先推行全域人畜分离；率先建设全域绿道网；仙居国家公园率先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公园试点，为全国绿色发展提供了“仙居素材”，其用鲜活生动的实践诠释了绿色化的发展轨迹，创新了绿色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其中，协同治理的复合联动机制是绿色化发展改革的重大创新。仙居县从根本上倡导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等多元化的参与主体，让绿色化发展成为仙居县上下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创造有利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外部环境，降低决策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有效地突破了困扰绿色化发展的瓶颈问题，主动适应了社会治理新常态。

仙居县地处灵江水系的源头，是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省级生态功能区，是浙江省东南部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仙居县是国家级生态县，境内绿色植被保护较好，仅 2700 公顷的括苍山自然保护区就有野生维管植物 1399 种。其中，分布有南方红豆杉、榧树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4 种。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绿色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理论背景

（一）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是一门新兴的交叉理论，是“协同”与“治理”的有效结合。治理（governance）最早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常与统治（government）交叉使用，意思是指挥、引导以及控制，主要用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堪认为，治理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管理活动，它未必获得正式授权，主体也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

强制力来实现，却能有效发挥作用。协同学（synergetic）的创立者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他在“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协同的概念，1976年出版的《协同学导论》系统地论述了协同理论，1983年《高等协同学》的出版标志着协同学理论走向成熟。“协同学的研究对象是由大量性质相异的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复杂系统，对这些子系统如何通过合作产生宏观尺度上的空间、时间以及功能结构进行研究，特别关注那些借助自组织形式出现的结构，最终得出与子系统性质无关的支配着自组织过程发展的普适性原理”。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很多关于协同治理的著作文献开始在欧美世界广为流传，但也仅仅围绕企业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三个概念来进行，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发明适合所有国家的模式。可见，协同治理努力建立的不是某种理论体系，更像是一套科学的方法。正如菲利浦施米特总结的那样：“协同治理是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和冲突的调节方法或机制，通过这一方法机制，参与者按谈判与合作的规则做出既能使各方满意，又对各方有约束力的决定”。可以说，协同治理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解读绿色化发展的理论框架。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逐步重视对协同治理的研究，但仅仅局限在对协同治理理论层面的研究和归纳。在协同治理概念方面，杨志军、朱纪华、李辉、任晓春、杨清华等人在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要义的基础上，认为协同治理是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互动和决策，最大效率地提高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效能的行为。在协同治理应用领域方面，刘晓、郑巧、李莉等人认为在政府转型大背景下，政府在加强与第三部门、私人部门合作的同时，主要起到协调和分配的作用。在公共危机中的协同治理研究方面，沙勇忠、解志元认为应建立协同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设立独立的协同治理管理机构；幸红、赖先进认为应完善和畅通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协同治理主体间的信息共享和传播。可以说，学者们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如何

完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对策。在协同治理理论的主体研究方面,何炜、李霞、于胜道等学者认为社会组织参与是必然的,这些研究对本文研究的思路构建和理论阐述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 绿色化发展理念

“绿色化”这一概念,于2015年3月24日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是继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概念的提升——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外,又加入了“绿色化”,实现“五化”协同推进。“绿色化”这个词,并非是一个凭空造出的概念,而是有着一定的历史演进逻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美化全中国”为主要内容和理想追求的绿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口号,发出了“向环境污染宣战”的号召。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做出了“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战略指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将这些战略具体化、全面化,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把“实行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纳入“十二五”规划,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从狭义的层面上讲,绿色化应该涵盖三个方面,即资源节约、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资源节约要求减少对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使自然资产

得以保值增值。污染控制要求减少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在生产的源头、过程和终端三管齐下,实现零排放或近零排放。生态保护则要求保护湿地、湖泊、海洋、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可见,潘家华所说的绿色化不等于绿化,他主要强调要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循环、绿色、低碳。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赵建军认为,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绿色化就是把绿色的理念、价值观,内化为人的绿色素养,外化为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外化为企业的绿色发展模式、绿色产业、绿色产品;外化为政府部门的绿色管理、绿色治理、绿色教育方式。可以看出,赵建军认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要设置绿色指标,实现绿色转型。如果这四化能达到绿色要求,绿色化也就实现了。

本文以仙居县为个案,从协同治理理论角度实证分析仙居县绿色化发展的运行机制,进一步探讨绿色化发展协同治理复合联动治理的创新机制和完善路径。

三、协同治理秩序生成:仙居绿色化发展的运行机制

仙居县积极探索绿色化发展创新模式,着力破解传统公共行政效率的低能化、公众参与动力孱弱化的困境,形成“政府主导、社会自主”的多方协同治理模式。仙居县绿色化发展运行机制之所以能够成功,归根结底在于多方面的协同治理。政府部门、各类社会组织、群众、企业家等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到政策规划、宣传动员等多个环节,完善协调联动机制,上级与下级、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内部与外部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了党政推动、上下联动、社会发动、人人参与的工作局面。这一机制扩充了参与主体的范围,打破了单一的权力集中与固定式分配走向,使参与的主体间建构起合作关系,通过环环相扣的工作步骤,形成不同于原有的“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不仅释放了治理活力,还规范了行政权力的运行。

(一) 多主体参与

多方参与主体的有效进驻，能固化协同治理的各项优势，增强力量间的协调整合，从而推进绿色化发展的有序化发展。仙居县通过组建复合联动参与机制，政府部门、各类社会组织、群众、企业家等各类主体多方参与，形成上下互动、全民发动的绿色化发展改革氛围。

一是政府部门联动推进。成立仙居县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面设立绿色经济发展工作组、绿色生活推广工作组、绿色城乡融合发展工作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组、现代化治理推进工作组等五个工作组。仙居县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每两周开展绿色化头脑风暴沙龙活动，促使各级干部形成绿色化发展的常态思维和工作准则，使绿色决策更科学，绿色新政更接地气。设立适应绿色化发展的大部门管理体制和区域联动机制，对环保、林业、水利、农业等的综合执法部门进行整合。

二是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建立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伙伴关系，提高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已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仙居县有1.5万名志愿者和300多个志愿组织，在推进仙居县绿色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举办了20多次志愿者活动，以示范的力量呼吁全社会参与绿色化行动，形成人人参与绿色发展、人人参与绿色建设的生动局面。

（二）多环节支撑

多方复合联动的秩序生成需要动力、责任等相关因素的激活，主体间的交往互动，能为公权职能行为的操作与监督提供一条可行性秩序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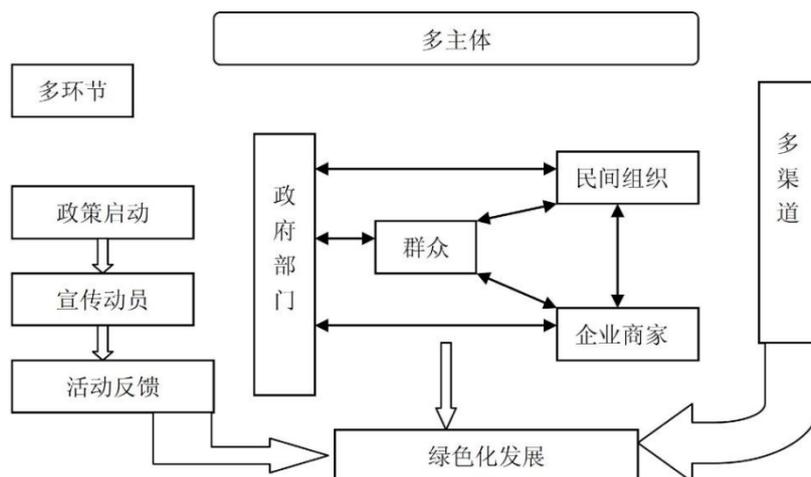


图1 仙居县绿色化发展复合联动的运行机制

一是制度规制与技术支撑。仙居县在《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探索建立绿色化工作考核机制，积极推行绿色GDP考核评价制度，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反映绿色化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体系，使绿色化工作可量化、目标化、指标化。另外，仙居县坚持以绿色化理念引领和指导“十三五”规划，把绿色化发展的内容、任务融入规划中，分解到乡镇和部门，落实到具体项目上，以项目化、指标化的方式使规划易评估、能落地，使绿色蓝图可操作、能实现。2015年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批复后，仙居县就主动与省委党校对接，组建“浙江省县域绿色化发展研究智库”，邀请国内省内绿色化发展研究专家上课，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课程和现场教学点，多次邀请国家发改委领导、中央党校教授、省发改委领导等来现场指导，提供菜单式服务。

二是组织化合作动员宣传。组织化合作动员宣传是调动政府、社区、各类民间组织等多方参与绿色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仙居县委宣传部、县多城同创办、社区、各类民间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多层次的绿色生活宣传，开展主题教育。依托“全民生态文明月”、世界环境日、世界地球日等节日，集中组织开展绿色、生态、环保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知识和方法。

（三）多渠道干预

多渠道地开展干预、监督，以权力制约权利，提高了科学治理水平，优化和提高了办事能力和效率。

一是建立绿色考评和责任追究机制，全面推行实施绿色化发展考评。根据乡镇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实行

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生态文明建设一岗双责制。

二是完善督查考核机制。用绿色化考核体系来统领全县综合考核，县人大、政协发挥一线作用，对重点改革项目开展定期视察和评议。

三是建立跟踪评估机制。要求各牵头单位适时地对重大试点任务进行跟踪评估，县绿色办进行总体评估，确保各项试点任务取得实效。

四是建立现代绿色治理机制。加强顶层设计，谋划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统筹推进形成大考评导向、大部门管理、大区域联动、大执法监督的管理体制，提升改革综合效应，为全县绿色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四、复合联动的多维立体效应：仙居县绿色化发展的价值透析

仙居县绿色化发展的多方的同治理的复合联动机制激活了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了自发秩序的生成和扩展，有效突破了传统社会治理的“运动式困境”，实现了社会治理的常态化。

（一）权威嵌入与技术规训，形成了组织化的治理秩序

仙居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绿色化改革，多次通过县委全会、经济工作会议、动员大会等对试点工作进行部署，书记办公会议每季度听取工作汇报，联席会议每月研究工作开展情况。每周一次专题研究项目工作，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牵头召开项目现场会、专题会、推进会，形成专题会议纪要，各单位都不折不扣地执行，并针对问题，开展专项督查，狠抓工作落实。仙居县绿色化发展的复合联动机制不仅有各级政府的强效推进，还有民间权威的示范效应，同时还建立起了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技术规训，探索出了绿色化发展的新路径、新方法、新模式。各级各部门将任务分解到每一个时间节点，具体到项目，落实到专人，确保了试点工作达到预期成效。自试点实施以来，实施了“千人计划”，“500精英计则”等重大人才工程，加强对绿色化发展的人才智力支撑。深化与上级政府部门，行业机构、科研院所的联系合作，积极争取各级人才到仙居县下挂锻炼，从而更好地获

取了各类资源，更好地推动了工作水平的提升。该县广泛招才引智，建立了全县绿色化发展专家智库，20多名相关领域重量级专家成为仙居的智库成员，与中央党校、北京工商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省发改委、省委党校等合作，开展县域绿色化发展课题研究，借智借力推进绿色化改革，开设“仙居绿色发展大讲堂”，开展“仙居绿色发展大培训”。这些措施充分发挥了新型智库资政建言、舆论引导等重要功能，保证了各项工作高起点、高标准的得以推进。有效地破解了绿色化发展的难点节点问题，凸显了权威性和专业性，提升了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实现了绿色化发展工作的增效。

（二）信任构建与环境支撑：认同了基层党组织的红色身份

保护绿水青山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善老百姓的人居环境开发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因此，仙居县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工作紧紧抓准了基层党组织这个红色渠道，制定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绿色化发展改革的工作机制与考核办法。仙居县制定了全国首个综合性绿色化发展指标体系，率先制定了县级《绿色化发展指标和评价体系》，在十大社会领域形成绿色公约，一整套科学的绿色评价体系及约束机制已日趋完善。同时，仙居县积极改革考核体系，对县级部门、乡镇、平台实施绿色化发展考核，制定“辛苦指数、服务指数、创新指数”系列考评办法，构建一套“绿色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仙居县在绿色化发展实践中，走群众路线，用红色推进绿色。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工作能不能使老百姓产生存在感、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在绿色化发展试点过程中，仙居县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让老百姓知道和理解绿色化发展是怎么回事，而且通过党组织、党员动员群众共同参与到绿色化发展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来，上下联动，带领群众，使得全民生活

方式绿色化的理念明显加强，公众绿色生活方式的习惯基本养成，形成了人人、事事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在基层党员的先锋示范号召下，落实了“一控二减四基本”体系，推动了“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畜禽养殖排泄物资源化利用、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秸秆综合利用与焚烧、农业投入品废弃包装物回收处置、废弃农膜回收处置”6项任务，减少了面源污染，实现了种养平衡。

（三）多元监督与多方参与，实现了治理常态化

仙居县统筹编制“十三五”各个规划，开展“多规合一”试点，探索形成全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仙居县制定和完善绿色发展的财政投入、金融保障、产业激励等政策体系，仙居县委通过《关于加快建设生态文明 大力补齐短板 深入推进绿色化发展改革的若干意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保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仙居的决定》，县财政建立1亿元规模的绿色化发展基金，各个部门陆续制定出台《绿色项目高速审批办法》《加快生态工业发展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等10多项推动绿色化发展改革的“政策清单”，全面激活绿色发展后劲。如前所述，仙居县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改革单位各自为政、发展无序、机构重叠的工作局面，建立“四大协作区”，打造保护、治理、监管“三位一体”的生态体系，设立了适应绿色化发展的大部门管理体制和区域联动机制，对城区4家大的医化企业进行了整体搬迁；对全县477家工艺品企业进行了分类分批整治；对全县“三废银”行业进行了全面整治，清理取缔了338个非法冶炼点；对永安溪沿线的采砂和石材加工行业进行了集中整治，关停采制砂场45家，关停非法石材矿山17家。仙居县坚持用好“五水共治”“三改一折”“四边三化”等政策组合拳，全面开展“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山”五大专项整治行动；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实行县城、中心镇、一般乡镇、村四级污水处理体系；推进“厕所革命”，弥补公共设施短板，两年来新建改造旅游厕所88座，确保城区和全

县所有景区都有 A 级厕所；全国率先实现城乡空气质量（PM2.5）监测系统全覆盖等。目前仙居县境内绝大多数河段的水质达 I 类标准，全年空气指标基本都在二级以上。着力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垃圾减量化处理、城市污水处理、地下管网建设等，建设百里全省最美的永安溪绿道网，为市民提供了休闲生活慢行系统，持续增加了绿色公共产品供给，让大众共享绿色民生建设成果。

五、仙居县绿色化发展的完善路径

绿色化发展改革，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操作层面，都没有系统地阐述，也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可以说，绿色化发展改革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战略工程，笔者认为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完善，方能突破“运动式困境”。

（一）提高效益方面：有机整合生态、经济、文化资源

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那么仙居县的绿色化发展必然要把着力点放在发展质量和效益上，要把生态优势和文化特色与绿色经济有机整合，产生生态、经济、文化综合效益。其中，经济效益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在生态旅游方面，先分析旅游市场需求侧的变化特征，再进行供给侧的规划布局，实现生态经济化。

（二）产业结构方面：传统产业循环化与新兴业态绿色化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指的是突出绿色发展的全面性、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既要着眼于生态经济新兴业态对绿色发展的引领，也要重视对传统产业进行清洁化循环化改造，遵循产业生命周期和产业结构发展的内生规律，保证本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整合发展要素，新区、经济开发区、台湾农民创业园、科技产业园、神仙居旅游度假区等产业与城镇产业联动发展，构建具有内生产业链的绿色产业体系，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同时要增强绿色产业体系对绿色就业和

生态富民的支撑力，促进产城融合，提升绿色城镇化质量，把仙居县打造成全省生态经济功能区的实践样本。

（三）明确目标方面：以绿色小康作为总体目标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仙居县不仅要把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工作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而且要把绿色小康作为绿色发展的总体目标，使全面小康社会独具特色，全面深化生态富民发展战略，从而保证一切工作的落脚点都放在绿色小康上。把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在实践中统一起来，通过创新绿色小康模式精准发力，深化生态富民战略。

（来源于：《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刘芬）